

Chinese Youth's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in
Manchukuo, 1932-1945

Yuehtsen Juliette CHUNG

抵抗的創意：《滾滾遼河》與滿洲國
青年的抗日活動（1932-1945）*

鐘月岑**

*本文受到諸多幫忙支持，首先感謝三位匿名評審的意見使得本文更臻完善，編輯們的細心校閱，同事李卓穎和柳書琴教授慷慨贈與書籍資料，清華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的借閱服務，紀剛資料庫主要建檔者張筱梅博士輔助查找檔案影印資料，最後是錢致榕教授的敦促，及政治大學博雅書院和中國海洋大學行遠書院的支持。

**鐘月岑，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副教授。

聯絡方式：juliette.chung@gmail.com、ytchung@mx.nthu.edu.tw。

摘要

東北青年如何抗日？滿洲國的日本警察特務如何監控這些青年人的抗日活動？其中滿族青年在這些抗日活動當中，如何看待自身視國民政府為滿洲王朝的敵人，而自己又為日本宰制的處境呢？本論文是以清華大學圖書館特藏的紀剛先生所捐獻有關《滾滾遼河》的手稿文獻為基礎的研究項目，探討抗戰時期滿洲國在日本控制下東北青年的地下抗日工作情形。由於抗戰後國共持續內戰、大陸淪陷、冷戰期間的兩岸對峙，使得這段東亞歷史中「不能說的祕密」更加詭譎難解，成為國共兩方的抗戰專業史家以及目前仍舊存活並散居兩岸與北美的歷史當事人爭辯的焦點。本文擬透過紀剛先生所捐獻其親身參與東北地下工作收集的文獻資料，進一步耙梳與解讀這一段血淚交織、眾聲喧譁的歷史，尤其是滿洲警察解讀剖析的抗日文藝作品與地下抗日所生產的文本。有別於史學理論上詹姆斯·史考特 (James Scott) 的經典著作《支配與反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以美國南方白人與黑人以種族和階級為主的二元對立和被動的反抗論述結構，本文立基於中國東北日本人／滿人／漢人錯綜複雜的民族和種族的互動關係，探討1930與1940年代滿洲國文化秩序中的文藝書寫活動與政治。

關鍵詞：滿洲國、紀剛、滾滾遼河、抵抗、抗日活動

Abstract

How did young people in Northeast China resi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How did the Japanese secret service monitor their cultural activities in *Manchukuo*? How did the Manchus view these activities within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saw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as their enemy, when they were ruled by the Japanese? The different modes of spatial knowledge these historical actors have employed in narrating the borders of culture and geography have expanded our horizon of this time/space of conflict.

This paper explores Chinese young people's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in *Manchukuo*, based on the materials donated by renowned Chinese writer Ji Gang (紀剛). Ji Gang participated in these activities under the cover of a medical student, and described them in his well-received non-fiction book *Rolling Liao River* (*Gungun liaobe* 滾滾遼河). The paper focuses in particular on the Japanese secret police's reports, donated by Ji Gang to the Tsing Hua University Library, that analyze the anti-Japanese content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hese reports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hidden transcripts, in terms of James C. Scott's definition. However, Scott's work on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is framed within a dichotomy of dominator/dominated.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multi-sided contention in *Manchukuo* involving interactions among the Japanese, Manchus, Han,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through their literary writings.

Keywords: *Manchukuo*, Ji Gang, *Rolling Liao River*, Resistance,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1941年12月30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的三週後，滿洲國日本警察大肆逮捕大約一百多名來自齊齊哈爾、哈爾濱、長春、瀋陽的國立大學學生，其理由是學生們在校園內外參加抗日組織活動。日本特務機構發動逮捕地下組織的行動進行得極為保密，放線觀察的時間頗長，分為兩個案件，首先是貞星事件中逮捕鐵路局某工人，而株連到的東北鐵路黨部籌備人員王文宣；他於12月14日被捕後，逼供招出國民黨東北調查室和黨部專員同志。另一個案件從長春財務職員養成所學生陳樹滿等組織的讀書會，因為受到之前貞星事件牽連，於12月30日被檢舉收押起，擴大至各大學學生及文化界，統治當局稱之為「一二·三〇事件」，戰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也均以此為稱。¹根據國民黨在滿洲國的東北黨部負責人羅大愚的記載，此事件對國民黨在東北的抗日活動打擊甚大，幹部指導員26人中有17人蒙難，另外23位駐日專員在日本被捕，使得留日組織無法再恢復。就區域而言，齊齊哈爾、哈爾濱、長春、瀋陽、北南五處破壞最大，就工作性質而言，以學校青年和文化部門為甚。日本掃蕩地下抗日活動的手段如此之決斷、迅速與全面，羅大愚的臆測是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想預先防堵任何抗日意識危害到戰爭之可能發展，因此決然收線（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1: 122-131）。²

另外，對國民黨東北黨部抗日活動的另一次重大打擊是1945年5月23日，抗戰結束前夕，日本在滿洲的特務機構逮捕了以羅大愚和紀剛為首的3000多名黨部成員，這次「五二三事件」幾乎將整個黨部組織連根拔起（*ibid.*: 158-163）。東北沒有單一的監獄可以容納這麼多的犯人，因此這些成員被發落在不同的監獄中，遭受日本警察各式各樣的嚴刑拷問，沒想到

- 1 名稱雖是相同，但是兩個政權對此時期抗戰事蹟的歷史詮釋歷來爭議繁多。近年遼寧大學出版社針對此事件增訂出版專書，論述國共雙方的歧見——此事件屬於國民黨還是東北左派青年組織的活動等。參見鄭新衡（2010）。
- 2 羅大愚的回憶錄收於《山高水長》七卷合集的首集當中，由羅大愚的同志們代為收集出版，時間從1983年跨越到2005年（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1973年5月10日羅大愚去世，當時總統蔣中正先生特頒褒揚令：「立法院立法委員羅大愚，賦性忠貞，制行堅毅，抗戰期間，在東北糾合同志，從事抗日工作，備歷艱危，克彰智勇；雖為敵警逮捕，身受酷刑，始終不屈，尤徵節槩。茲聞病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表前功，而昭忠義。」（國史館1973）

這些被捕的成員不約而同地堅強抵抗嚴峻的拷問，其中囚禁在長春監獄的紀剛，在不招供的意志力堅持下，面對著日本特務軟硬兼施的手段，在特務科長相勸不尋短的好言中，嚴詞回應：「在原則上說，東北是中華民國的國土，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中國以及世界沒有承認滿洲國，我們更不承認。今日，中日兩國正處於交戰狀態，現在我看你們是日本機關和日本官吏；在沒有被捕的時候，我是你們的敵人而不是叛徒，現在我是貴國的俘虜而不是奴隸。」（紀剛1997: 350）除了嚴刑逼供與慷慨激昂的回應外，紀剛回憶了過程中更多可歌可泣的事蹟，他說在1945年8月初日本投降的前夕，日本關東軍下令以四平為分界點，釋放拘留在此以南的黨部成員，以北者則處決為是。在四平有六位成員被捕，另外按規定，日本應該釋放通遼西邊八位成員，但是基於某些莫名原因，日本軍要求從通遼西邊的八位成員中挑選一位志願者到四平這邊，殺一半留一半，否則威脅要將他們全部殺害。其中一位張林標同志就提議以鬪為定，實際上自己志願到四平犧牲被殺，最後救了其他成員。³

這種自我犧牲、成就群體大我的精神在紀剛著作《滾滾遼河》和地工同志們的回憶錄中比比皆是。本文意在探討這些東北青年如何抗日？滿洲國的日本警察特務如何監控這些青年的抗日活動？其中滿族青年在這些抗日活動當中，如何看待自身視國民政府為滿洲王朝的敵人，而同時自己又為日本宰制的處境呢？這些歷史行動者對東北／滿洲不同的空間認知，及其對這一邊境文化地理的不同論述拓展了我們對此衝突區的時空視野。

一、研究文獻討論與史料說明

以往的滿洲國研究繁多，⁴無法全盤討論，而且此篇論文無意也無法鉅細靡遺地論述整個滿洲國的歷史。以下沿著歷史事件演變時間的進程，順次擇要地討論。環繞滿洲國成立之前的九一八事變，多著眼於外交、政

3 〈紀剛影音訪談〉，見莊慧玲、謝小芬編（2011），識別碼：A1-E-023-001。一部分文字稿已經整理出刊了，請參見紀剛（2011: 98-100）。

4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張錦堂（1981）以及井村哲郎（1995）。

治、軍事和國際政治交涉的過程，最典型的研究如黃自進（2006）分析九一八事變時期的日中政治動員與軍事作戰，該文比較日本關東軍對付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的東北軍的「一戰二和三撫」策略，以及東北軍分別的「拒戰懼戰觀戰」反應，顯示出關東軍充分的準備與對東北情勢的掌握。滿洲國確立之後，學者的研究焦點則關注初期東北內部勢力的消長，英國學者米德（Rana Mitter 2000）研究此時期在民族主義的動員下「抗日」論述的產生，如何透過媒體報導，塑造領導東北義勇軍的馬占山為抗日英雄。在東北義勇軍勢力潰散和地方菁英所組成的東北救國會解散並撤離東北後，在地的勢力別無選擇，只有被動地跟關東軍合作。由於米德只研究到1930年代初期的發展，沒有觸及到1935年以後國民黨在滿洲國的地下活動，他比擬東北的抗日，猶如法國維奇政權抵抗德國納粹一樣，是後設的建構，以支持法國戰後重建的士氣，這是有所偏頗與不足的。

值得注意的是，米德所提出的「通敵合作」（collaboration）的議題引發學界許多討論，並揭開抗日戰爭期間，淪陷區或日本佔領區何以維持地方秩序與發展的議題。大衛巴雷和萊利雪（David P. Barret and Larry N. Shyeds, 2001）合作編輯的《和解的限制》（*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匯集學者廣泛探討在戰局不利的情況下，國民黨菁英如汪精衛和其他地方派系領導如何在各個日本佔領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種協商性的「合作」和其他知識菁英、資本家的被動合作帶有抵抗的意味，與維奇政權中的部分成員認同德國納粹是不一樣的。由於國民政府的能力有限，戰時無法保護被佔領區的人民，戰後清理時又沒有適當的法律來區分「積極通敵合作加入日軍編制」當「狗腿子」和「被動合作中有抵抗」以保護當地社會秩序的差異，使得戰後「漢奸」的審判案件或多或少出現有人虛報自己參加地下工作的紀錄（羅久蓉2000），還有甚者，以謊報求表功，這些戰後混亂現象應該是紀剛與其地工同志保持低調的原因之一。卜正民（2015）的《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深入探索敵我兩造的心態以及通敵合作與抵抗的複雜性，分析歷史行動者在當下選擇的動機、淪陷與佔領的混亂經驗、和統治者靖平重建的作為。他發現長江三角洲地帶的地方菁英多半選擇合作而

airiti

少抵抗，有些即使從日本人的角度看似是零星的抵抗，也可能是當地社群裡的內鬨。卜正民的研究集中在長江三角洲的經濟富庶區，其所提煉出來的史識判斷對學界很有啟發，但是對東北或其他經濟尚待發展的地區是否適用，亟待驗證。

更進一步，滿洲國內部的治理的議題，其標榜的「王道樂土」文化論述是否能夠取得五族協和和全面的認同呢？杜贊奇（Prasenjit Duara 2003）對滿洲國的文化和國家主權的研究曾經提出「東亞現代（East Asian Modern）」的認同是「滿洲國」的貢獻，它的多元文化主義、救贖的普世性和中西融合的文明精華既能涵括傳統政治理想，又是超越西方殖民主義的進步思想。滿洲國在建國初期，以王道的德治思想作為同化政策的指導原則，這是東亞地區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政治原理，也是政治文化的最大公約數，不僅受到日本統治菁英的支持，滿清遺臣、舊文人和知識分子也積極接納並順勢發揚闡述。林志宏（2007）與劉恆興（2012）所研究的鄭孝胥（1860-1938）和其他清遺民即是很好的例子。清末鄭孝胥曾官至湖南布政使及立憲公會會長，民國建立後為溥儀的內務大臣，1932年負責起草滿洲國國歌與《建國宣言》，官至國務總理。鄭與其他遺民所主導的官方「孔教」欲下達至民間社會，實踐時偏向形式化，侷限於私人親屬關係，欲配合日本皇國「萬世一系」道德倫理定於一尊的信念，而又無法無縫接合。立基於傳統道德的「王道」思想所撐起的「日滿協和」理想，他們甚至進而企圖以此理想影響日本和維持滿洲國獨立主權，這雖能迎合清遺民的情感與恐共排共的心理，但在日本不斷干涉內政並取而代之成為支配勢力，以及社會上普遍出現歧視和差別待遇的日常現實之後，他們的「樂土」大同夢想即成泡影，無法獲得新興一代在地年輕人們的認同，使得年輕的一代像羅大愚、張寶慈、高士嘉等獲得公費留學日本的優秀學生，或是梁肅戎、紀剛等國立大學學生紛紛加入反滿抗日的行動。韓國學者朴宣洽（2002）雖然研究羅大愚所帶領的地下反日運動，但是由於他所獲得的史料有限，分析只限制在「一二·三〇事件」，而沒有述及更加慘烈的「五二三事件」。由於目前海峽兩岸的特殊情況，加上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的黨史檔案資料沒有公開，無從查閱，是以筆者無法置喙其他留居大陸的地下抗日工作者的活動及其個人遭遇，例如當時「貞星事件」被

捕者之一的王長新教授，曾任教於吉林大學日本文學專業，如果當事人及其後人能夠留存當時資料或個人回憶紀錄，或許能夠與紀剛及其同志留下的資料形成有意義的參照及補充，但這方面的文獻方向企待各方的關注和徵集，或許留待以後另立專篇研究。以上研究文獻的回顧意在界定本論文的問題意識架構，其中或者啟發筆者思路分析的方向，或者成為筆者辯證對話的對象。

本論文並不是以文學或文學史的研究來定位紀剛先生撰寫《滾滾遼河》的文學成就或造詣，而是以清華大學圖書館特藏紀剛及其友人所捐獻有關《滾滾遼河》的手稿文獻為基礎的研究項目，藉以探討抗戰時期滿洲國在日本勢力控制下中國國民黨系統的東北青年的地下抗日工作情形，以復原一段被多種高居正典位置的權威敘事有意遮蔽的史實。紀剛等捐獻的資料，經由2010年時任館長的莊慧玲教授協同柳書琴教授和李卓穎教授提出國科會計畫，於2012年完成全部數位化，為數據資料庫，提供讀者免費上網查閱。這些藏品包括四個部分：1.《滾滾遼河》前身相關的手稿作品。2. 東北抗戰地工群體的來往書信約366封。3. 地工群體的私人文獻、文物與相關報導。4. 紀剛先生及其同志口訪約16小時的影音檔。這些地工們在滿洲國時期是日本關東軍急於肅清的對象，日本戰敗後又遭受共產黨接收群體和蘇聯部隊聯手的整肅，後來更是受到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排擠。國共內戰期間他們處境維艱，被迫在臺海分裂前撤離東北。1949年前後，他們循著不同路徑，經過香港、上海、青島等地輾轉來臺。抵臺者約有三百多人，除了羅大愚夫婦、梁肅戎及少數同志從事政治外，均依著自己的專業從事工作，如紀剛是小兒科醫師，高士嘉是成功大學教授，史惟亮從事音樂創作教學等。1947年到1965年、1966年到1990年在這些不同的時段中，他們彼此不斷書信往來，互通聲氣，彼此支持。前者討論撤離定居港臺等地的生活與工作，後者以編撰《五二三紀念文集》為中心，交換過去的抗日記憶與經驗，同時環繞紀剛的著作《滾滾遼河》的書寫過程展開討論，紀剛特請地工舊友們逐一閱稿，給予意見或回饋個人經驗。

除了書信聯繫，他們還組織「五二三聯誼會」，每年在各地都有大小

airiti

不等的聚會，直至2005年。⁵1965年正值「五二三事件」二十週年，由羅大愚主持籌備會，發出138份邀請函，徵求同志撰文紀念，出席者91人，其第二代12人，共103人參加聚會，收錄46篇同志的抗戰回憶，出版了《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文集》，自此創舉後，成立編輯小組，共同集資，陸續出版《山高水長》七集至2005年。國史館纂修柳長勛先生受當時羅家倫館長囑咐，負責《抗戰實錄》的整編工作。⁶1969年8月12日紀剛發表《滾滾遼河》，於《中央日報》副刊連載183天，柳長勛於12月11日和20日連續致函紀剛，表示國史館與國民黨黨史會達成共識，欲將《五二三紀念文集》及《滾滾遼河》原稿逐節加一標註、送史館掃瞄，做成微卷，存放在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匯輯文件分為：原始文獻、工作回憶、敵僞罪行、人物素描和當年的詩歌文藝作品等類別，作為珍貴史料珍藏。⁷1970年1月9日羅大愚與紀剛回函柳長勛曰：

吾兄熱心彙建「東北敵後抗日史料」專檔，並有選輯出刊的計畫，我們感佩之餘，非常願意響應你的號召，遵照所示分類、專題和限於抗戰範圍各點，全力來做，因為來台志友不多和原始資料奇缺等種種關係，我們不能做到完備周詳的地步。又為求一人一事的確實無訛，有時要經過幾個人的互相對照訂正，所以完稿也不能太快。（柳長勛1995: 33）

1970年1月13日，柳再修一函給紀剛，除了彙建抗日專檔外，欲將地工同志的回憶錄輯集成專書《東北現地抗日史狀》，並附錄手抄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心得筆記，以強調史料蒐集之重要。⁸1977年7月20日柳長勛呈現《東北現地抗日史狀》之具體目次，並將當時所收集到的回憶錄放入卷二〈地下鬥爭〉的第二篇「載述」和第三篇「人物」當中，自己

- 5 根據2005年出版的《山高水長》第七卷，因為聯誼會成員日漸凋零，這次聚會出版的最後，雖找尋到第二代接棒，但由於沒有再次出版《山高水長》第八卷，筆者可以確認大型聚會不再，但不得而知剩下的成員是否持續舉辦小型聚會，即使有，也不見公開。
- 6 柳長勛先生從1967年升任纂修，至1981年退休，歷經羅家倫和黃季陸兩任館長。羅館長推動《抗戰實錄》工作，由柳先生編輯收錄，其收錄涵蓋時間起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其所收錄的資料檔案，目前仍典藏在國史館審編處的檔案庫房裡。見簡筌筌（2009）。
- 7 見莊慧玲、謝小芬編（2011），識別碼：A1-B-352-001-008以及A1-B-353-001-006。
- 8 見莊慧玲、謝小芬編（2011），識別碼：A1-B-354-001-009。

寫就一篇〈歷史失落了——為《東北現地抗日史狀》寫〉作為第一篇「敘論」。並且在目次前面訂立纂例曰：

一、歷史功能在於探求真象，汲取教訓，啟迪新知〔…〕集納可信史料，顯影九一八事變後東北現地抗日實況。大分兩卷：卷一游擊作戰，卷二談地下鬥爭。各析（載述）、（人物）、（文件）三篇；略附圖片，以助瞭解，偶摭詩詠，而備采風〔…〕

二、史實考證，以第一手資料最為可貴。是以訴狀選材，取當時文獻報導作骨幹，補之以現地抗日成員筆述。然以史料蒐徵困難，不得已插入少量局外人士或新聞歷史從業者撰錄參詳。所有資料，一一註明出處。務期內容真確，言出有據。

三、日本投降，瞬逾三十載。文獻散佚，人事滄桑〔…〕良以事過境遷，時空轉軸。政爭葛絞，立場互殊。歷史重建既難，功罪之銓評不易〔…〕為助瞻衡全局，特撰（敘論），冠諸卷楣，供鑒判焉。

四、東北現地抗日，事至慘烈，為一篇血的歷史。史狀所收，大致係議和前物故忠烈事蹟，其文多由相關人士紀撰；雖或略病飾揚，但究能存真貌〔…〕

五、國史編修，必須持心如水。最忌伐異黨同，泯滅史實。東北現地抗日，本質上為一救鄉匡國運動。血氣之倫，均為致力〔…〕本狀於國青二黨史料，較為齊整；至其他黨系及社會賢豪資材，則殆付闕如。（柳長勛1995: 37-38）

同年12月5日柳長勛簽署國史館「抗戰史料敘檢表」，評估判斷：

蒐典：前中國國民黨東北各省市黨務聯合辦事處成員撰寫，總負責人羅大愚代輯提。

稽考：本筆述係作者群就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五月為該組織「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回憶，重訂親謄，經羅氏整審，共十六篇，都十萬三千八百字，極為可信。

衡判：史源可靠性—可靠性極大。史徵確實性—證實可信。報導詳實、甚具參考價值，應選輯入東北現地抗日史狀。

內容提要：記述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地下抗日實際工作概況，包括業務動態、地區情形、宣傳誌略、應變事例、與受難紀實，及部分殉國忠烈追思。

處理經過：列入史檔、永久保存。⁹

之後柳長勛給予紀剛的幾封信中念念不忘的，仍是上述這部抗日史狀的出

9 見莊慧玲、謝小芬編（2011），識別碼：A1-F-038-003。

刊。¹⁰其中柳君有一段話挺能啟發我們專業的史學工作者：「普通寫歷史當然什麼引用的材料都求『真』的。但『真』的史料未必反映史事的實相。而文藝作品反而可以反映出當時的社會動態和歷史人物的心理狀況。這也許就是《遼河》的可貴處。」¹¹柳長勛的直覺式判斷，來自多年不斷在史館中浸淫史料蒐集彙建的訓練，信手拈來就直指《滾滾遼河》自傳式小說與眾地工回憶錄的根本差異，兩者雖然都是重構過去，但是前者動態地抓住歷史現場感，全面觀照地建構各個歷史人物之間的情感關係和權力位階的互動，後者則是以傳主的視野，直線式地回溯時間座標中的人事物的樣態，並對之發表感受心得或意識的品評判斷，而無法全面觀照歷史進程中事件的發展。紀剛說：

寫《滾滾遼河》的初衷，是希望把地下工作成員的奮鬥史紀錄下來。地下工作結束後，領導人希望我們撰寫「回憶錄」，集結大家的文字出版了《山高水長》這本書，內容包含地下工作的情形，同志的犧牲與苦痛，不讓蒙難的人們白白被歷史洪流煙滅。但是，我認為回憶錄多少會隱惡揚善，淨說些過五關斬六將的功績，畢竟無名小卒的回憶錄不會有人願意閱讀，因此，某些複雜的過程和面向難免就無法呈現。歸根結底，只有小說具有現實的多面性和廣泛的影響力〔…〕所以當時我就拒絕了羅大愚的要求，而開始偷偷撰寫《滾滾遼河》，我想用小說的筆法描寫真實的歷史，展現革命奮鬥的真人真事、真流血、真犧牲和真感情。後來羅大愚知道了，就提醒我：「用小說的寫法，不管怎麼改編愛情故事都行，但是工作故事是歷史真實，非得對讀者負責任，不能瞎編！可以用地下工作事實寫歷史，寫小說不能耍賴，不能破壞歷史。」這也正是我寫《滾滾遼河》的立場，希望盡到讓歷史流傳的責任，以「生命寫史，血寫詩」！（紀剛2011: 152-153）

上述兩種文類的文字，均是本文的研究論述的材料根據。在引用和分析上雖有分梳，但並無上下優劣之別。

就如紀剛和梁肅戎等人依其親身經歷做出的判斷——抗戰時期，國

10 據筆者各方搜尋，目前尚未看到這部《東北現地抗日史狀》出刊，而國史館《東北抗日地下工作專檔》的史料收集，也在1981年柳長勛退休後不再進行。但是此專檔仍在國史館的檔案庫房裡典藏，研究者需要以個別的人名或事件來進行調閱申請。而紀剛與其地工同志們持續按照柳長勛所立的《史狀》纂例方式收集編輯同志們的回憶文字與其他作品，發表於《山高水長》的系列紀念文集直至2005年。

11 見莊慧玲、謝小芬編（2011），識別碼：A1-B-366-002-003。

民黨在東北的敵後工作最多也最有成就，共產黨方面似乎較少（梁肅戎1993），紀剛舉證說：

前兩個月〔1993〕我回東北一次，在哈爾濱，特別去參觀由中共所設立的「東北烈士紀念館」。館內的陳列分兩大部分。一為抗日戰爭時期的，一為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戰爭時期是由1945年到中共建國前。這一時期的烈士史蹟，最後都註以年月日為國民黨所殺害。抗日戰爭時期的烈士，則多是九一八事變初期的義勇軍——中共統稱為東北抗日聯軍所死難的軍民，烈士多是陣亡於某次戰鬥。其後十餘年則很少記載。抗戰是國共合作時期，假若把此時期國民黨人的死難烈士列入，倒可彌補這段空白，但中共不算。由此倒是可佐證，抗戰時期東北地區中共黨的地下工作較少。¹²

即使在東北抗日烈士紀念館如此公開的國家記憶的場域裡，都無法見到共產黨展現自己蒙難同志的地下工作事蹟。再者，目前臺灣研究學界對中共黨員檔案資料取得有困難，因此，筆者只能緣著手邊可得的這些史料範圍展開闡述，本文對共產黨在東北發展地下工作的歷史過程將無以著墨。期待大陸檔案館和學者能夠挖掘史料，開放史料，並且有根有據地闡述共產黨的抗日事蹟，而不是讓視覺媒體以抗日神劇來混淆大眾對歷史的認識。¹³

另外，在這些捐獻的文獻當中還有一份日本祕密警察的文藝作品分析報告，來自當時服務於滿洲國警界的加藤豐隆的贈與，並由紀剛所藏。

由於抗戰後國共持續內戰、大陸淪陷、冷戰期間的兩岸對峙，使得這段東亞歷史中「不能說的祕密」更加詭譎難解，成為國共兩方的抗戰專業史家以及目前仍舊存活並散居兩岸與北美的歷史當事人爭辯的焦點。本文透過紀剛先生所捐獻其親身參與東北地下工作與眾多地工同志的回憶和收集的文獻資料，進一步把梳解讀這一段血淚交織、眾聲喧譁的歷史，以及滿洲警察解讀剖析的抗日文藝作品與地下抗日所生產的文本。以紀剛及其同僚的活動為中心來探討1930與1940年代滿洲國文化秩序中的文藝書

12 紀剛的這一段話是在梁肅戎（時為立法院長）參加「九一八事變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的主題發言的幾點補充之一（紀剛1993）。

13 英國牛津大學米德（Rana Mitter 2013）教授出版《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綜合了美國、英國和中國的檔案史料及報刊和個人日記，直接回答了「誰抗日？」的學界大問題，並主張國民黨的軍隊在抗日戰爭中最有貢獻。

寫活動與政治，有別於史學理論上詹姆斯·史考特（James Scott 1990）的經典著作《支配與反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以美國南方白人與黑人的種族和階級為主的二元對立和被動的反抗論述結構，在這些資料和文藝作品所投射出的中國東北日本人／滿人／漢人錯綜複雜的族群互動關係，東北青年並不是以奴隸自居來看待支配自己的暴虐主人，而是作為土地的主人面對強大的外虜的侵略，他們不得不虛與委蛇地與日本人合作以求潛伏，又時而滿漢結盟，以滿漢一體來尋求對抗的機會，在全面對抗中也可以看出中日同代年輕人彼此不同的生命選擇。¹⁴

紀剛與其所屬團體透過同志間的彼此扶持、生死與共的生命經驗凝聚了群體認同，在認同中以具體行動來創造自己與群體的存在意義。標題上所列的「抵抗的創意」，即是借用史考特「隱藏的文本」的概念來理解、並闡釋紀剛與其同僚以隱晦隱喻的文字語言、書信、口傳等媒介，和來往傳遞情報與宣傳抗日工作以招募新進的手段，來逃避滿洲警察的郵件檢查與思想控制，以及祕密警察如何解碼東北作家們的文藝作品中所透露的抗日訊息和反制情緒。繼而，「創意」可以歸納為兩層意涵：一者是意義的創造，二者是抵抗隱喻的藝術化創造。「意義的創造」有眾多例子見於地工同志們的回憶錄中，紀剛自是不在話下，現只舉孫寶珊和白文麟二例。孫寶珊在回憶崇直（呂文毓）在「五二三事件」被捕入獄，被日警凌虐至殘，勝利後不久即去世的文章中說，原本自己的計畫是到後方去抗日，但是崇直勸說她：

不能說到後方去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但是〔…〕敵後的工作更重要，更需要有膽識、有熱血、有決心的青年來擔任、日本速戰速決的夢早已破滅。今後的戰爭是長期的總體戰〔…〕要想瞭解敵人，就必須深入敵人的組織〔…〕我們生長此土，具備許多工作上優越條件，我們青年人要在敵後組織起來，集中意志，集中

14 當時同樣被關在長春監獄裡的犯人除了國民黨地工們，還有日本的思想犯如反戰的具島兼三郎（1905-2004），戰後成為有名的唯物論學者，曾任職日本長崎大學校長。他在獄中與梁肅戎同一牢房，非常佩服梁視死如歸的精神，而梁也驚訝地發現可惡的日本敵人當中也有值得尊敬的理想主義者。見具島兼三郎（1981）。

力量，化消極的抵抗為積極的行動，造成敵人的心腹之患，破壞敵人軍事、交通等各項建設，牽制敵人一切行動，必能削減他們前方的作戰力量，一個人若在嚴密的現地組織下進行活動，真不知好幾十百倍於同一個人在後方所能發揮的力量！¹⁵

聽了崇直一番話後，孫寶珊決定留下加入工作。而白文麟則自述自己從1937年滿洲國中央陸軍訓練處軍官候補生第五期畢業後，到1945年光復為止，始終擔任軍官一職，1938年宣誓加入國民黨後即負責在軍中吸收同志，共30餘人，準備隨時起義，武裝抗敵。他認為：「那時候每個人都愛參加組織，都想著為什麼我們中華民族這麼不爭氣？為什麼小日本可以這樣欺負我們？為什麼不能憤起自強？所以大家讀書畢業，不是說看哪裡錢多就做什麼工作，是要看能不能對國家有貢獻。也因此吸收同志非常容易，只要你觀察好，這人有作為就可以吸收他。」¹⁶這些年輕人除了愛國愛鄉之外，還渴望創造存在的意義，愛國愛鄉是未發的主觀情感的本然存在，加入群體，付諸行動以創造存在意義則是已發的行動結果，這是標題中「創意」的第一層意涵。至於第二層意涵借用史考特「隱藏的文本」的概念來理解「抵抗隱喻的藝術化創造」，「隱藏的文本」則是文學藝術表現的手法策略，遊走於敵我之間，意在傳達訊息、激發同志間熱情，同時又不被敵人戳破攔截。筆者在後面第四節「民族認同和抵抗的創意」和第五節「抗日文學生產與日本祕密警察的文藝解碼」會依次分析。

二、戰爭記憶的喧嘩政治

在中國大陸，有關抗戰的公共記憶直至改革時期才逐漸浮現。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政權後，由於抗戰的記憶可能會無意間使人們想起國民黨政權領導抗戰勝利的貢獻和撩起共產革命起源的爭議，抗戰的記憶糾雜纏繞在國共內戰、韓戰、美蘇冷戰裡頭（Mitter and Moore 2011）。再者，沒有任何退役官兵的組織團體進行其戰爭經驗的回憶敘述和記錄整

15 見孫寶珊〈憶崇直〉（五二三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1981: 42-48）。

16 見白文麟〈從頭說起〉（五二三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1981: 74-76），以及對白文麟的訪談，見莊慧玲、謝小芬編（2011），識別碼：A1-E-027。

airiti

理，使得一般民衆和老兵對抗戰集體記憶均呈現普遍性的沉默（Diamant 2011）。

在戰後日本，退役老兵的作戰日記、筆記、褒令和證言都受到美軍駐日的盟軍司令部的審查。直到1980年代，各式各樣證詞跡象出現後，公衆和學界才重新燃起檢視戰爭時期的歷史的興趣（Moore 2011），諸如「南京大屠殺」、「慰安婦」或歷史教科書詮釋「大東亞戰爭」問題，日本總理每年8月參拜靖國神社，而靖國神社裡除了供奉日本歷來為國家社稷戰死的軍人和軍屬之外，還奉祀掀起二次大戰的日本甲級戰犯，這些議題直到今日仍然是日本右派分子與周邊鄰國激烈論辯的焦點。

相較於中國大陸和日本，中華民國政府於1952年設置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於1954、1995、2013歷經改名，現簡稱為退輔會），提供退役榮民就業、教育、醫療、家庭照護及其他服務。除了六十萬官兵跟隨國民政府遷徙至臺灣外，另外有六十萬的行政人員、眷屬和其他老百姓歷經空襲、炮轟、居無定所、饑荒之後跟隨而至。¹⁷國民政府所領導的抗戰勝利不久，隨即遭遇國共內戰的連續挫敗，灰頭土臉，被迫遷至臺灣落腳。即使在臺退役官兵享受不錯的退休福利，也能聚集各省各地的鄉親或宗親會組織來解消思鄉之苦悶、或相濡以沫地訴說彼此熟悉的戰爭之痛苦經驗，但是國民政府並不鼓勵退役官兵公開發表戰爭記憶和出版戰爭的經歷，以至於老兵們的回憶錄、日記、戰地筆記大多是自費印刷出版（*ibid.*: 415-416）。¹⁸直至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國民政府不再限制民間出版戰爭記憶等著作，1974年，國民政府甚至出資製作電影《英烈千秋》，表彰張自忠將軍英勇抗日、在湖北襄陽彈盡援絕的情況下壯烈犧牲的事蹟（汪宏倫2014: 203-204）。

不像其他作戰的官兵所受到的待遇，從抗戰時期開始，重慶國府對羅大愚和他在東北從事地下情報工作的同僚們即存有隔閡和猜忌，¹⁹戰後輾

17 對於外省籍官、兵、民遷徙至臺的統計數據歷來有爭論，筆者是根據林桶法（2009）的估計。

18 《山高水長》合集即是貼切的例子。

19 羅大愚所領導的特工同僚是直接聽命於當時中央祕書長兼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統

轉來臺後，政府更不可能重視他們。根據紀剛的說法，他們之所以不受特別的重視和照顧，主要是因為戰後重慶國府尚未發布東北接收人事命令之前，身為黑龍江和吉林省黨部專員的紀剛即與同志、地方原有武力及前滿洲國官僚聯手組織成約有十四萬人的光復軍，阻擋蘇聯和共產黨勢力的介入，隨後中央派任熊式輝處理東北接收事務，特別提防主導西安事變、綁架蔣介石的張學良影響下的地方勢力組成的光復軍，而直接指揮東北各黨部的CC派勢力，也因為張學良事件的影響，特別反對東北存有任何武力，因此隨附中央，不願承認光復軍，導致許多光復軍成員後來投共（紀剛2011: 103-107）。

即使在國民政府不鼓勵戰爭記憶的抒發和書寫的時代氛圍下，羅大愚與其倖存的地工同仁們，每年5月23日必定在臺灣聚集，一起紀念他們的「五二三蒙難日」。1967年，羅大愚和紀剛自費出版了「五二三事件」廿週年紀念集，1974年又出版一書來紀念1973年去世的羅大愚。但是早在1946年，紀剛就開始書寫回憶形式的文章〈葬故人〉，發表在《東北公論》月刊上，一直到1947年雜誌停刊。1951年紀剛寫就廿萬字的《滾滾遼河》的手稿，但未竟完成，1956年再寫《愚狂曲》手稿十萬字，仍然沒能完稿。

1965年5月23日正是廿週年的年度聚會時，羅大愚交付一篇報紙登載的文章〈瀋陽奪圍〉予紀剛及其他地工同志傳閱，並相互討論文章當中所描述的抗戰地下工作細節。〈瀋陽奪圍〉的作者本身未嘗參與地下工作，純粹熱情想像，以「間諜故事」的文學形式來吸引讀者的興趣，因此激起同志們論辯，是否該由「外人」主筆其奮鬥抗戰的血淚史。同志吳尹生表達自己在工作中和卸任後從未有擔任「間諜」之感，他不禁懷疑，如果交由「外人」作家來改寫，改寫的作家要以何種形式來書寫才能忠實表現這群

計局（中統局）局長朱家驊先生（羅大愚的工作報告暨計劃書可見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1939/06-1944/02〕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06-242，此宗檔案名稱是「東北黨務：羅慶春（大愚）與東北黨務工作」），而中統局與戴笠所領導的軍統局時有人事和經費的傾軋，見王良卿（2012）。CC派為中央俱樂部組織簡稱，其帶頭的主幹為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均是蔣介石倚重的國民黨重要成員。

airiti

同志們的抗戰精神和真實過程中，如組織、工作、領導人等細節；紀剛認為即使外人改寫，應以第一人稱「我」的寫法，而且「我」不能是主角，才能縱橫運筆故事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因為單單祇是個人角度出發，常會渲染個人的功績，而忽略其中失敗的細節，以至於無法扣人心弦；羅大愚則以〈瀋陽奪圍〉重傳奇性情節，「取糟粕棄精華」評為失敗之作，勉勵同志們自己執筆書寫，此番來回的書信討論和評論最終催生了《滾滾遼河》（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1: 627-631）。

1966年秋天紀剛發願重寫，綜合之前幾部未完手稿，終於在1969年完成《滾滾遼河》四十五萬字的鉅作，8月12日在《中央日報》副刊連載，在1970年4月完成連載後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當年度即獲得第五屆中山文藝獎。但在《中央日報》副刊連載前依要求刪除揭露國民黨在戰後東北接收的腐敗部分。在出版成單行本之前，歷經同志們、家人、朋友故舊幾番來回討論建議修訂而凝聚共識，最後敲定情感故事中的人物，因保護當事人故有虛構人名和些許浪漫情節之外，內容中的事件和活動細節皆為真實呈現，紀剛在其口述傳記《涉大川》當中即表示他在《滾滾遼河》中記載了99%真實的青年抗日活動（紀剛2011: 107, 152-153）。故純文學出版社發行者林海音女士認為《滾滾遼河》雖為小說形式，但是內容并非作者虛構的故事，作者窮其半生而完成，忠於史實，是關乎國家的、民族的歷史，她認為小說形式祇是為吸引更多的讀者（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1: 632-635）。當時國史館纂修抗戰史的柳長勛先生也認為《滾滾遼河》為一活的歷史，欲以書中有關人物的工作回憶錄輯成一部「東北現地抗日史狀」，除此之外，柳先生認為此書對日本特警虐囚套供之罪行描寫可以存證以供控訴（紀剛1997: 2-3）。筆者認為小說之形式固然吸引人，但是以小說的敘述結構來體現這群特工的工作回憶錄中人與人互動的生活樣態和情感空間，其動態、具體、靈活更是其他敘述形式所比不上的。

《滾滾遼河》單行本出版後，中國廣播公司將其製作為「小說選播」聯播全臺，接著復興廣播電臺再製作成廣播小說，在全臺13個臺巡迴播

出，1977年又由中視公司改編為連續劇，從5月16日至28日每晚於黃金時間放映，至1982年的五年期間即印刷30次。1997年純文學出版社結束營業，由三民書局接手時已印刷超過56次。由於《滾滾遼河》受到如此廣大的好評，林海音、王藍和柳長勛均勸說紀剛復原之前所刪除的國民黨在戰後東北接收腐敗的敘述，但是紀剛則謂：「政府由南京撤退到臺北，已經承受了歷史的裁判，我不願別有用心的人，在它痛定思痛，復興圖強的時候，利用我的文字做為他們攻擊的武器。」（*ibid.*: 8）紀剛認為他所刪除的是情緒性的語言，真正批判的意見都像鋼釘般，保留在字裡行間，粗心的讀者或鈍感的官員是感受不到刺痛的（*ibid.*: 9）。相比較，地工同志們在回憶錄裡，對國民黨高層在東北復員接收時忌憚張學良勢力的捲土重來，而指派與東北毫無淵源的熊式輝來主事有較多批判。

此書有兩個日文翻譯版本：一是由加藤豐隆（1978）翻譯、自行出版的《滾滾遼河：「滿洲國」治下・中國知識人の獄中鬭争》；另一版本是山口和子翻譯的《遠き祖國——滾滾遼河》，其翻譯篇章先是在《創價學會會報》（《創価学会会報》）連載刊行，之後書的形式則在1993年由東京國書刊行會（国書刊行会）出版。兩位翻譯者與紀剛素昧平生，均是志願奉獻者，前者曾任職於哈爾濱市警察局，同一時間正是紀剛在學校從事抗日地下工作時期，戰後日本投降，被拘於蘇聯五年後被遣返，因此對《滾滾遼河》的興趣執著在「五二三事件」中紀剛等人在長春監獄中的鬭爭，似乎能夠領會紀剛在書中所表達的「整個滿洲國就是個大監獄」的雙關語。除了翻譯《滾滾遼河》之外，加藤另著有《滿洲國警察小史》三大冊，目的在於揭露滿洲國的建立乃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結果。而後者山口女士生於長於哈爾濱，並在當地完成中學教育，日本投降後才返回日本，先是在日本NHK電視臺擔任中文翻譯，後於創價大學（創価大学）任教，協助中日文化交流，因為讀《滾滾遼河》感同身受，而自願無償翻譯出版，為的是讓以征服者自居的日本人讀後反省，其翻譯則認同作者的觀點，採一字不漏的方式，忠於原著，山口也曾將《滾滾遼河》改編為舞臺劇，於1983年紀剛訪問創價大學時首次演出。

兩種日文翻譯版本的出版均遭受日本出版界不同方式的漠視，山口版本被推薦給日本有名的《文藝春秋》和《產經新聞》連載出版，但石沉大海；加藤版本曾和新國民出版社交涉，也是毫無回音，王良先生歸納三個原因：1972年中華民國與日斷交，日人持觀望態度，《滾滾遼河》的字數太多，出版社多為營利著眼，很難要求出版界高調倡導社會良心、真心懺悔、記取教訓云云（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1: 639-644）。中日斷交後，日本變本加厲，擅自在其歷史教科書中將「侵略」改為「進出」，在此政治氛圍中，山口版本和加藤版本在日本的流通僅僅限於朋友、學生的小範圍讀者群，對比之下，臺灣官方的大力宣傳及其民眾對《滾滾遼河》的熱烈接受，可以視為臺灣對抗日本抹消戰爭記憶的抗議，表達其陷入國際孤立的憤慨，尤其是被所謂冷戰下的區域盟友——日本——後背插刀暗算的不滿。

三、面從腹背的抵抗與國民黨的地下抗日工作

前野茂（1945年擔任滿洲國文教部次長）在他編輯的《滿洲國史》中評論，一二·三〇事件的肇因是來自國立大學校園當中學生所組織的祕密社團，這些國立大學學生從小受到日本效忠天皇的理念熏息而養成，而且其家庭背景均是來自地方菁英與政府高階官僚的子弟，照理而言不應該成為抗日反滿活動的主力。前野茂判讀，民族主義、日本官商開發所帶來的經濟剝削和土地圈刮、因種族和社會的歧視所造成的日農和漢農之間對立均是促使此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重要因素。至於五二三事件則是1940年代初期之後國民黨在東北設立黨部，在各大學積極煽風點火的結果（前野茂1972: 418-419）。前野茂的解讀忽略了國民黨在1940年之前的動員布線，國民黨早在1935年即派遣羅大愚到日本留學，主要目標是網羅留日的滿洲學生，前野茂也低估了東北在地的文化認同的力量——以滿洲東北為鄉愁、以遼河為故國象徵的文學表達對象——所蘊育的愛家愛故里的強烈情感。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占領中國東北，除了馬占山所帶領的東北義勇軍由地方團練勢力自發組成積極抵抗日軍之外，張學良的正規軍竟然不思迎戰，²⁰拱手讓關東軍予取予求，於是所謂的「滿洲國」于1932年3月1日成立。1933年5月31日，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後即解散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組織，²¹使得東北義勇軍的地方武裝力量凋零成游擊散勇。²²在此過程中，國民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這些游擊隊伍或跟隨原東北救國會地方成員向南撤退到北京集結。爲了避免正面與關東軍衝突而造成傷亡，國民黨于1935年成立東北反滿抗日協會（簡稱東北協會）的民間組織，由齊世英主持。東北協會代理東北黨務辦事處五年後改組，轉進淪陷區的天津英租界，遙控東北黨務活動，暗中支持國民黨在滿洲國的抗日活動。該組織分支東北各地成七個區：「遼東」、「遼西」、「吉東」、「吉西」、「黑東」、「黑西」和「哈爾濱市」，均有專任委員和指導員，聽命於中央黨部祕書長兼中央調查局長朱家驊，但由於東北敵後戶口不易取得，地區黨務不易推行，遂行雙軌制，在正式省黨部之外，另成立「專員辦事處」以遴選長期住在敵後的東北同志，以便從事滿洲國內組織、政治、軍事情報等工作，如遇危險、系統發生破綻，另一系統仍可繼續工作，不受牽連（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4: 101-103）。與此同時，東北黨務組織將約五、六百人的滿洲國留日學生作爲爭取對象，1929年曾留日又因九一八事變返國的羅大愚，在1935年6月就因此被東北協會網羅，奉派潛赴日本留學，再轉進回滿洲國工作，東北三省共遴派12人赴日，1936年3月羅大愚連同張寶慈、高士嘉、劉世恆、趙允衡、梅慶春在東京成立「東北留日青年工作核心小組」以爭取和培訓合適

20 蔣介石下令張學良對日本關東軍採取「不抵抗」策略，背後的考量是希望透過國際聯盟的壓力迫使日本退兵，因爲有前例可循。1895和1919年日本因戰爭勝利，曾經主張對遼東半島和德國租借地的權益，卻在國際的干預和壓力下撤回其主張。參見米德（Mitter 2000: 5, 189-224）關於馬占山帶領的抗日活動的論述。

21 東北救國會於1931年9月27日成立，由地方推舉菁英27位爲委員，包括張學良、閻寶航、錢公棻、梅公任等等，或捐助款項或募集義勇兵士，以抗日爲行動目標。參見米德（Mitter 2000: 157-188）。

22 東北抗日義勇軍的人數從1931年22萬名減至1934年63,300人，到了1937年以降只剩下14,900名，1940年則僅存1930人了（朴宣泠2002）。

的工作夥伴，擴大組織（羅大愚1983: 1: 61-64）。²³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國民政府全面展開抗日戰爭，1938年8月羅大愚與張寶慈前往重慶、成都謁見齊世英和朱家驊，策劃在東北邊區建立游擊基地，當時國民政府無暇顧及於此而未成，國民政府的策略思考是——將淪陷區的抗日活動從正面迎戰轉為地下抵抗活動，希冀透過學校同學、出身同鄉、工作同業、各場域的恩庇主顧等等的親緣地緣關係網絡，以出版、散播、傳閱抗日的文藝、時事、政論思想作品，激發同仇敵愾的反日情緒。透過雙軌制，網羅的新進同志直接聽命當地地區的專員指導員，避免橫向跨省的串連和聯繫，如此，一旦被抓，傷亡或逼供時造成的組織破壞就能及時打住，不易形成大規模的株連、甚至連根拔起之後患。但是，此制度也會招來意想不到的結果，亦即位於後方的中央黨部無法直接掌控和指揮各區域的成員，若無羅大愚等核心成員居中聯繫登記並爭取活動經費補助，地區組織和幹部成員容易被誤認為共產黨員、或時叛時附的當地土匪幫子。而各地區組織之間沒有連橫通氣，也容易發生派系鬥爭（紀剛2011: 93-94）²⁴。

從1935年到1939年，羅大愚一共從日本招募了78位東北學生返回滿洲國布置工作網，1939年11月受命成立東北抗戰機構的總部辦事處，分布於東北各省13區，包括瀋陽、安東、通化、四平、錦州、長春、吉林、哈爾濱、濱江、龍江、北安、黑河。每區設指導員一人或二、三人擔任指導任務，總共廿三人為此一階段的領導幹部，此時工作人員均有僞職，且來自各行各業，在政治經濟文化都市或交通軍事工礦中心之縣市，建立工作據點（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1: 118-119）。1940年11月，國民黨設置了東北文教委員會，除了延攬專員機構以外的資深同

23 羅大愚雖然1929年就被網羅，但由於國民黨的派系紛雜，彼此角力，他直到1944年才正式入黨（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1: 49-51）。

24 國民黨這種間接指揮地下情報人員的雙軌制在戰後發生很大的問題，如果碰到地區負責人死亡或失蹤而無法指認情報工作人員的真實身分，容易造成誣陷。這個問題在戰後熊式輝指揮東北的復員時經常發生，有些地工人員被構陷為漢奸，而另外真正的漢奸卻假冒地工名義，躲避戰後審判。

志，也網羅了在滿洲公開露面的校長、教授、記者、小說家、詩人以及滿洲國協和會的成員，以推動文教與宣傳工作，抵制奴化教育，增加學校的工作人員（ibid.: 119），以東北通訊社為文教委員會之業務機構展開地下文藝活動與宣傳，出版百餘種小冊子，只有六十四開大小，可放於口袋中，便於攜帶，蔣介石手著《中國之命運》是當時到西安受訓的黨政幹部冒險帶回的，只在這個工作團隊裡悄悄傳閱（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1981: 149-153）。組織成員繼而滲入滿洲國協和會（詳下文）刊物《青少年指導者》，《大同報副刊》《營商日報副刊》等機關主持編務，以影射隱喻筆法傳播思想。紀剛認為這段時期機構發表了許多篇具有戰鬥性的文藝作品，鼓動了人們的抗敵意識，一時風雲際會，蔚為壯觀（ibid.: 165-175）。

除了文藝出版外，黨部組織還經營1家書局，19家新聞社，1家助產士學校和4家圖書館。這19家新聞社主要負責翻譯最新時事、收集分析情報、編輯出版期刊。直到1944年12月，組織的統計顯示曾經放送336次的廣播演說、48次的廣播抗日節目和投放105篇文章於各個期刊單位。成員利用其滲透的偽職搜集情報並加以統計分析後，不定期向重慶報告，有時散播謠言，例如偽政府將要沒收典當的物品，蔣宋美齡夫人即將訪問東北等等動搖社會民心之言論（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1: 732-755）。

滿洲國協和會以溥儀為首，鄭孝胥為代理，受到日本關東軍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及司令官本庄繁的支持，於1932年成立，為了擴大影響，於1934年重組，網羅了眾多官員、教師以及社會名流。協和會意在促進日中俄滿蒙韓六大民族和諧共處，向公眾推廣體現於滿洲國之中的大亞細亞主義（Mitter 2000: 94）。從1937年4月起，所有16至19周歲的青年全部義務加入到協和會附屬的滿洲青年聯盟之中。在滿洲國建立末期，雖然絕大多數國民或多或少與協和會都有所關聯，但實際上於他們而言，加入協和會只是例行事務。1938年協和會成員為100萬人，到1943年已增加至428萬，而滿洲國當時的總人口約為4000萬（Duara 2003: 73）。由於滿洲人口眾多，

羅大愚認為最好的策略是通過教育、宣傳以及諸如文藝演出、詩歌比賽、文學討論及評論等文藝活動向人民宣傳民族國家的觀念。國民黨的東北協會通過動員大學校長、教授、新聞記者、小說家、詩人以及各場域的高官在媒體和校園中發動文學運動。其工作重點有三：1. 抵制奴化教育，灌輸與啟發學生的民族思想，展開思想作戰；2. 設置東北通訊社為文教委員會常設業務機構，刊行秘密書刊，展開地下的文藝活動與文字宣傳；3. 推動公開文藝活動，由文化界同志創辦新時代出版社及作風刊行會，滲透協和會刊物「青少年指導者」、《大同報》副刊、《營商日報》副刊等主持編務，並公開發表文藝作品，採用影射和隱喻筆法，擴大反日宣傳（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1: 118-119）。

原則上，組織任務包括情報蒐集。成員們潛入官僚體制及區域教育系統中，以此構成組織的地下情報網絡。由此，東北黨部收集的情報通常會傳達至重慶總部。根據紀剛口述，這個地下工作系統並不與國民黨中央直接聯繫，以免整個組織被日本特務連根拔起，只有負責人負責對外聯繫或對內交代任務，若有意外，則由他人接任。這些學生成員的工作內容分為「八綱十二部」，²⁵八綱就是利用個人所學專業分別進行工作的辦法；十二部就是工作對象，利用各種辦法和人脈管道打入工作機關裡頭。以下是羅大愚所列舉的關於特工任務的一些描述：當一名特工潛入鋼鐵廠後，他會悄悄解開起重機的鏈條和掛鉤，以此削弱機器的運煤能力。另外，他會告知同事錯誤的信息，使他們誤用機器甚至損壞機器部件，以此削減鋼產量。在醫學實驗室中，他們會通過往下水道中傾倒乙醇或其他珍貴的化學製品來妨礙實驗工作。區域主管經常會收到諸如倉庫失火，電力變壓器或熔爐被灌水，氧氣管、油罐、工廠設備及設施偶然爆炸的報告。其他任務包括煽動社會衝突、工廠及採礦業罷工，破壞公共工程及公共設施，以及竊取公共財產和物資。1943年，張光主持的地下文學社遭受揭發破壞，但並沒有牽連其他分組同志

25 八綱就是組織、訓練、宣傳、滲透、調查、行動、物力建設、掩護。十二部是動員各行各業和各民族包括政治、協和會、軍事、警憲、紳商、青年、文化、交通、農民、工人、婦女、蒙旗之抗爭革命運動（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1: 140）。在大陸也有文史工作人員于堤概述羅大愚的地下組織，見于堤（1993）。

和區域；滿洲國的名作家于家麟，筆名駝子，其在蓋平的文藝外圍團體發生破綻，導致團隊的逮捕時，也沒有株連到其他的地工人員（ibid.: 1: 140-147）。²⁶

對於臥底行動，紀剛曾舉過一個生動的例子：「例如我們想辦報，並不是直接成立報社，而是滲透到已有的報社機關之中，慢慢取得機會，利用現有的資源進行宣傳工作。」紀剛將這些工作分為三個階段：1. 祕密階段時期——在此階段不能引起社會注意，例如殺日本人，此事反而會造成社會上的緊張；2. 半公開階段——成員開始針對一些特殊分子像是漢奸，在適當時機，給予這批人一些教訓跟警告。紀剛稱，「之所以這樣進行，一方面可以使在日本人底下做事的人有所警惕。另一方面，對敵人來說，因為你針對的不是日本人，也不會受到重視與關注，簡單來說這就是鋤奸的工作。另外一個我自己也做過不少的，就是消耗敵偽物資，例如把火車椅墊割破、打壞路燈等等，這些事情看起來是小事，敵人也不知道是誰做的，但是會造成一種風雨飄搖的氛圍，使人對這個國家產生負面的看法」；3. 公開階段——就是做正式的武裝鬥爭，利用黨部在東北所部屬的武力，滲透到滿洲國的鐵獅部隊或是河北的軍隊，把日本人趕出去。此一階段尚未來臨，日本即投降（紀剛2011: 96）。²⁷與具有軍事武器裝備、發動進攻並為當地群眾帶來慘重損失的游擊隊不同，這些抵抗活動的目的在於招募新成員和滲入滿洲國的行政系統收集情報，並在中國學生和其他職業人士間擴散抗日宣傳，以此提升他們的民族認同感。卜正民認為，這些抵抗活動未必能打倒日本，甚至會促使通敵者與日本侵略者組成聯盟（卜正民2015: 247-296）。但是這些情報工作在戰時以及日常生活中依然不可或缺，因為通敵者可以被策反成為地下工作者

26 由於1942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東北黨部原先對第二次日俄戰爭的軍事動員的工作目標，演變成為了策動軍事叛變的準備行動。另一方面，針對韓國的地下滲透活動在探員被日本特務驅逐後被迫中止。見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1: 118-120）。關於于家麟的生平及其在中國大陸的戰後處置，見其女的網上回憶錄（胡相洋2015/08/14）。另有鄭德庫（2015）的徵文文章〈以《星火》的名義〉回憶于家麟滿洲國時期經營《星火》社的過往。

27 這些口訪由清華大學柳書琴和李卓穎教授負責，紀剛影音訪談，收在莊慧玲、謝小芬編（2011），文件名：A1-E-018-001.flv, A1-E-019-001.flv, A1-E-020-001.flv, A1-E-021-001.flv。

(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6: 515-546)。²⁸

紀剛透露了關於招募新同志的一些細節：所吸收同志須來自新同志所提出的具有可信及被吸收潛力的名單，由組織派人多方考察接觸後決定。在這些加入的同志當中，除了有位吳葵芳女同志因故嫁給日本特務，害怕連累同志要求退出之外，少有變節者。這個故事也被紀錄在《滾滾遼河》的情節中（紀剛1997: 55-71）。當紀剛決定招募吳葵芳進入組織時，他經常拜訪她的居所，以致她的父母將紀剛錯認為自己女兒的戀人。稍後，當她就家庭與組織之間的兩難抉擇向紀剛諮詢時，紀剛建議她專注於家庭並辭去組織職務。他相信她不會將組織的情報透露給日本祕密警察。而她的確沒有，為了不成為通敵者，吳葵芳夫婦隨後搬於日本定居（ibid.: 97-98）。²⁹

在1944年，國民黨的東北支部擴大到132個，其中遼寧省擴至66個，吉林省擴至27個，黑龍江省擴至45個。同時城市和鄉村的黨員人數也在快速上升，在1944年5月僅18,434人，到1945年5月已有30,049人，而至同年10月已升至44,402人。另外，在包括滿洲國通訊社、獸醫與畜牧大學等一些機構中，有三分之二的任職人員都是國民黨黨員。許多縣級職位和農村地區，甚至有國民黨黨員擔任校長、警察和村長等職務。羅大愚及其同僚認識到青年乃發動社會動員和改革的關鍵所在。他們招募的大多數青年都是職位較低的公私機關職員、官員、中小學老師或二十歲左右的大學生（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1: 712-713）。另外，國民黨東北支部潛入軍事院校並建立了名為「真勇社」的祕密社團。真勇社人數從1935年的20人增至1943年的70人，到1945年成員更多達400人。但在這些人中，近一半人在日本戰敗前便表現出了支持共產黨的傾向（孫邦1993: 752-753）。³⁰

28 根據羅久蓉（2000）關於戰後對通敵者的審訊研究可以得知，儘管許多通敵者宣稱他們在戰時為國民黨地下情報工作服務，並在審訊期間提供了文件材料，但只有那些提供了官方文件的人才能夠被送往收容所。

29 1992年，吳葵芳在給紀剛的信中稱，由於她對自己脫離組織的理由保持沉默，她在工作中受到了其他同志的指責，同時，她也受到家暴的折磨。見於吳葵芳的信，莊慧玲、謝小芬編（2011），文件名：03C29_010100。

30 真勇社為臥底於滿洲國、官至中校的王家善組建，王早先為國民黨軍官，後受關東軍賞識，並被選派至日本陸軍大學學習，他以同鄉情誼吸收在日訓練的陸海軍官學生一同抗日反滿，共產黨員何正卓一開始就不斷接近王家善，對之進

四、民族認同和抵抗的創意

陳映真曾經向紀剛提出一個問題：「同樣是從事地下抗戰工作的抗暴文學作品，為什麼《滾滾遼河》裡的青年，那些覺覺團弟兄們的思想，都是向人性的上限發展，把一切個人的理想希望，都寄托在國家民族的大群上；而法國沙特的作品，卻是向人性的下限發展，退縮到以赤裸裸的個體，面對非常的暴力？」（紀剛1997: 10）紀剛的答覆是：

我們最初發起覺覺團的時候，祇是基於青年人的熱情與自覺，我們就不願做日本人的奴隸，所以一遇到東北抗戰機構時，便全體奮勇參加。一二·三〇事件後，組織遭受重大破壞，因而採取化整為零政策再以抗戰團體方式活動〔…〕我們不在現地抗戰，我們還做甚麼呢？當時的動力可以說是理智的實踐；認為我們所做的是應該做的〔…〕不計其成果如何；這可以說是力求人格的統一，做到盡其在我的意思。未去內地的時候，我們總覺得國家民族與我們很近很近。〔…〕我們在現地抗戰，在敵人的鐵蹄下奮鬥，覺得我們的工作是那麼切實而具體，可是一到西安，回到祖國以後，卻忽然感覺到國家民族距離我們是那麼遙遠。〔…〕我們仍然回來，回到我們現地抗戰的工作崗位上。這一次既不是熱血的衝動，也不是理智的實踐，若勉強分析的話，可以說是為了道義，為了信守，為了對同志對朋友那點人與人間純真的情感，喚起我們參加工作的，是國家、民族等等大題目；支持我們繼續工作的，只是為了守信用、講義氣。（紀剛1997: 232-233）³¹

最初是天真浪漫的熱血愛國精神驅動著這些青年人，但是後來抗日能夠堅持下來的力量，則是來自信守然諾的同志患難情！換句話說，若不是為了

行思想工作，王告之以何應欽授命而組建真勇社。何正卓參與其中並為核心人物，因受一二·三〇事件牽連，於1942年3月被補入獄，王則逃避日本特務的監視，不敢繼續活動於真勇社，離開長春並接受第七軍管區少將參謀長的任命。自此，真勇社的主控權漸漸由共產黨員掌握。抗戰勝利以後，王家善被蘇聯扣留，共產黨派石迪假借日本投降前已經加入真勇社之名，在長春恢復真勇社，並成為代理社長，取得羅大愚的信任，打入國民黨軍統特務組織，稍後造成張莘夫接收撫順煤礦被暗殺事件。而王家善逃回哈爾濱之後，找到了何正卓，兩人商議在東北組建一師，但未能獲得主事東北的熊式輝的重用，後來何策動王在1948年率部在營口起兵迎接共軍（孫邦1993: 751-765）。從這些細節的回憶可知，兩黨黨員和主持人盤根錯結，其記憶回敘的立場也跟他們在兩岸分隔後的遭遇有關。

31 紀剛回答陳映真的問題是就當時抗日學生們的感受而言的，似乎並沒有切中陳映真的要點。筆者以為這是與法國和中國不同的文化傳統如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與儒家的「信義」、「知恥近乎勇」的不同理念相關。

一二·三〇事件中有同志被捕，這些覺覺團的成員可能堅持不了。

紀剛的回答體現了一種在精神世界中歷經峰迴路轉而拉扯變形的民族認同觀。「現地抗戰」一詞則描繪了一群未經世事的校園青年投身報國的時代脈絡。據紀剛回憶，在蘆溝橋事變後，他當時所在的文會中學內，許多學生都希望能夠轉移到大後方去加入國民政府，一同抗擊日本。學生們經常尋求那些參與到全國教會聯絡網之中的傳教士的幫助，希望能夠入關到中國內地加入抗戰行列中。但紀剛的丹麥老師惠德本（約翰·瓦特，John Watt）卻反對此種愛國主義的行為。他告訴紀剛和其他學生，如果他們真的熱愛祖國，那就應該留在東北。惠老師以他自己的家鄉——在一戰中被德國占領的丹麥南部為例，提到在當時，許多有能力、富有的、知識淵博的菁英階層都轉移到了丹麥北部，以致于在戰後德軍撤退之時，南部發展遲遲滯後，其戰後重建所投入的資源花費，比戰爭的消耗損失還多。他說：「假若你們真想救國家救民族，就要留在此地，和你們的同胞生活在一起，教育他們、幫助他們、為他們爭取權利；如果你們有志氣、有知識的人都走了，你們的敵人就更容易統治他們、奴役他們。」受到惠老師的啟發以及被教會團體聯絡網拒絕之後，學生們最後留下來，並通過了入學考試，進入各所大學中參加抗日團體（紀剛2011: 71-72）。

紀剛在遼寧醫學院所建立的學生團體包括覺覺團、早朝體操團、新劇團、攝影研究會，都接受國民黨東北支部的指揮。紀剛來自遼陽西北方祁爾臺（現今為首山鄉所轄）的農村，父親是漢人，母親是滿人，根據紀剛自述家族的起源，由於明清政權更迭，東北經濟遭受破壞，清政府於是頒布「移民實邊」政策，以吸引大批漢人移墾，紀剛祖輩響應政策，順治八年（1651）從河北樂亭到東北開荒定居，到滿洲國時期，已有十幾代了（紀剛2011: 43）。儘管日本人和日本政府認為此地居民為滿人，紀剛認同自己和周遭同胞為中國人。當柳書琴教授於2009年夏天口訪他時，作為滿人，他坦然正視著對滿洲王朝的忠誠和民族認同二者之間的議題，紀剛認為當時滿人幾乎同化為漢人，以下是柳教授和紀剛的對話：

（柳）當時滿人還多嗎？自己知道嗎？

（紀）不多了，當時都同化了。

（柳）所以滿幾乎都是漢人？百分之九十都是漢人？

（紀）至少混血了。我母親就是滿人。他說「滿」，實際上就是講漢人。

（柳）那裡頭還會分滿跟漢嗎？

（紀）不會了。他不用漢，一〔用〕漢怕人心思漢。他說滿洲就是漢人。

（柳）所以當時叫作滿系文人、滿系作家，都是漢族？

（紀）對，都是。說滿系的都是漢人。

（柳）只有日本稱滿系，東北人自己不稱自己滿系？會嗎？

（紀）自然就稱滿系啦，我們也不去爭了。日本盡量，因為你中國好五族共和嘛，所以他日、滿、蒙、鮮、俄。所以滿系就是漢人啦。³²

日本人揮舞著武士刀機關槍，橫掃東亞地區，卻以大東亞共榮圈為名，來正當化對中國侵略的行為。他們以多民族和諧共處的名義以劃分種族的行為，恰恰激發了紀剛對自己身為滿族人和中國人的認同。不同於視民國為敵國的滿洲國權貴們或對清帝國抱持文化認同的遺民心態，³³紀剛的祖輩從清初移墾東北開荒的農民階級背景反而促使他認同漢人與民國的政治取向，代表著一般平民與文化菁英在文化認同上的差異。

1937年蘆溝橋事變，正當17歲的紀剛經學長的介紹，接觸到覺覺團的書記長張寶慈，而加入地下抗日反滿工作。在八年抗戰中，他先是臥底於遼寧醫學院就讀，後以一名內科醫生的身分居住於哈爾濱。《滾滾遼河》基本上紀錄了這些工作絕大多數的內涵，1940年代末到1970年《滾滾遼河》成書問世，歷經無數次參與這些工作的成員針對此書內容的討論和批駁建議，目前這些來往的討論文字均為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

《滾滾遼河》³⁴基本著眼在作者紀剛，也是小說主人公之工作與感情故

32 莊慧玲、謝小芬編（2011），識別碼：A1-E-010-001。

33 清遺民心態請參考林志宏（2009）的第七章「王道樂土：情感的抵制和參與『滿洲國』」。

34 紀剛的真名為趙岳山，於2017年3月7日逝世。筆者謹以此文向其致敬。

事的雙軌敘事上，從小我的戀愛事件、友情、同志道義到重大抗日事件和地下反日活動的群體經歷，充分展開小我與大我、感情與理智、組織理論和實務運行的衝突與張力。紀剛為其中所鍾情的兩位女性壓抑著本然的青春熱火，從其命名即可見端倪。一位是孟宛如——紀剛在訪談中說取名的含義是「宛如夢，就像一場春夢般！」，另一位是黎詩彥——其寓意即為「沒有歸宿的離失燕」。宛如是天真純情的女護士，紀剛從未邀請或暗示她加入覺覺團，因為她正是覺覺團所要保護的對象；而詩彥成熟而勇敢，主動解除婚約、追求自己所愛的人——紀剛——但卻因紀剛鼓勵她「將愛一個人的心，分散給大眾」而加入覺覺團。

另外一對仲直與方儀，是因著地下工作的需要而扮演夫妻的同志，在犧牲後卻成為真正愛侶。五二三事件之後他們雙雙入獄，仲直被滿洲首都警察的日本特務嚴刑逼供，這位特務除了逼迫交待工作的要項與細節，他並不相信仲直和方儀純粹的同志工作關係，為何青年男女同居一室而沒有夫婦之實，幾週下來的毒打，變本加厲地羞辱，還在日本投降的前三天強姦方儀，要仲直脫去褲子，求證是不是真男人，以測試兩人之間毫無男女情愫，仲直反擊特務，進而被刑求重傷昏迷幾天後致死。方儀得知仲直之死，傷心欲絕，日本投降後久久無法釋懷，不久抑鬱而選擇自殺。臨終的絕筆書要求紀剛償其與仲直合葬之心願。在絕筆書中，方儀分析自己的心理轉折，當大部分的同志都被日本特務關在長春監獄的時候，方儀在精神上與其他的蒙難同志患難與共，肉體是痛苦的，但是精神是激越的，日本特務的強姦對她而言是行刑的一種，與其他肉體的拷打並無區別而不覺得特別難堪，直到仲直為此與日本特務拼搏時，才意識到自己的「受辱」而深感心靈創傷，仲直之死更加深其傷痕。事後直到其他同志以男女關係追求方儀時，她才有了對仲直相許永恆的感受，唯有跟仲直相伴，她才能心地坦然而無愧赧。這是日本特務無法瞭解的中國青年的革命情操（紀剛 1997: 377-383, 443-447）。其抵抗不在比體力、能力、時間的長久，國家的強富或手段的暴烈，而是在最後終點的道德情感的意義的完成。五二三事件以後，滿洲首都警察廳特高科在研究這些青年成員為何誓死抗日的思想推移過程之報告中發現，他們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天下興亡匹夫

有責」之抱負和基督教初期傳道者的殉道精神，乃為可敬的敵人（ibid.: 654）。

紀剛認為自己加入地下抗日工作是為了一個「群」在奮鬥，而日本人則認為這是傳統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仁」；兩者是不謀而合的文化和國家認同，然而其中之差異是「群」的大小及其凝聚力的強弱，這是紀剛與同志間的共識：「國家民族是一個大群，那個大群太大，大得有些空虛遙遠。對於覺覺團，對於我們這個小群，永遠感到緊密切近。我們的理想希望是一致的，我們的憂傷煩惱也是一致的。我們在心靈上情感上，都成為彼此的一部分。〔…〕比這個小群再大一點的中群，便是東北抗戰機構，也就是在東北現地從事抗日工作的全體同志。」（紀剛1997: 10-11, 654）

這個認同可大可小、可張可弛的張力是日本統治者視野的盲點，以及紀剛和同志們動員校園學生、社團成員和爭取支持的話語空間。紀剛自己分析他的覺覺團同志的行為動力來自時代的驅使和自我的文化實踐，用傳統語彙來說是「內聖外王」，互為主體，這個個體生命與群體生命在特殊的時空脈絡下交互界定，有著五光十影的呈現。東北人民被日本人當做「奴隸」來統治，被遠在大後方的國民黨政府視為等待覺醒和解救的「奴隸」，但東北當地的青年則認為自己是家鄉的忠實保護者。他們不離不棄，像滾滾不息的遼河日夜環抱著土地，對紀剛及其同僚而言，遼河從來不是枯寂的荒原，而是具體明確的感情所依。遼河很近，重慶很遠，遼河從來不是客觀恆在的地理環境，而是鄉土的情感依託，遼河流動著源源不絕的活力，他們要效法遼河日夜地守護鄉土。紀剛在書中的〈遼河頌〉是這麼描述的：

滾滾的 渾渾的

你 永恆的遼河

渾渾的 滾滾的

你 永恆的流

你衝過那 千山萬嶺

你追求那 光明自由
你的胸膛 長滿了高粱大豆
你的脊背 牧放這豬馬羊牛
你世世與黃河握手
你代代向祖國翹頭

你痛苦的時候 毫不悲愴
你歡樂的時候 也不歌唱
你 背負著歲月沉積的泥沙
你 托載著千萬人們的希望
你從不訴說 你遍體敵騎的創傷
你永不改變 你飛躍奔騰的方向

你 渾渾的 滾滾的
永恆的流
你 渾渾的 滾滾的
永恆的流

〈遼河頌〉通過覺覺團之間緊密的紐帶將遠處的人們聯繫起來，其所具有的流動特質也是覺覺團成員情況自喻的象徵。我們可以將紀剛的地域詩歌與魯迅的地方概念做對比，杜贊奇認為，除了熱愛故土和思鄉之情，魯迅寫作故土的最主要原因是它亟需被改造成新中國（Duara 2003: 209-243）。不同的是，紀剛認為那永恆流動的遼河是代表著亙古不變、可以自癒的國土，即使是在敵人的鐵騎不斷地踐踏下。一位名叫羅雷的同志在信中向紀剛吐露，遼河是一個精妙的比喻，既囊括了不可撼動的革命方向，又體現了地下工作者們難以言說的苦難。而同志們從未抱怨過日本警察的折磨和拷問，也從未改變過他們獻身革命的方向（紀剛1997: 559）。

五、抗日文學生產與日本祕密警察的文藝解碼

爲了保護國土及所愛之人，紀剛及其同僚開展抵抗運動，基於反抗暴力的邏輯，意在推翻統治者及被統治者間的二元對立關係，這種抵抗的最後目標爲翻轉消解彼此的權力關係。這與美國人類學者史考特的經典著作《支配與反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1990），根基于美國南方白人與黑人建立在種族和階級的二元對立和被動的反抗論述結構有非常不同的反抗邏輯。史考特的研究主旨是透過研究馬來農民反抗經濟支配的日常生活形式，來理解並理論化政治學中的權力關係，例如歷史現象中的奴隸制、農奴制和種姓制的支配架構。史考特利用艾略特（George Eliot）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文學作品建構其理論架構，並指出在這個支配理論架構中，支配霸權的構成需要統治者的權力運作與被支配者的配合（不管主觀意願如何），如此在言語溝通和公共展演儀式的實作過程裡孕育出被支配者隱藏的文本。在公開衝突的爆發之前，隱藏的文本飽含情緒和感情的批判，甚至控訴支配的體制的種種壓迫、控制、剝削的手段（Scott 1990: ix-xiii）。

史考特認爲隱藏的文本具有三個特性：1. 針對一群特定的展演者，它具有特殊的文化社會脈絡；2. 它不止有著言語文字的表達，還包括許多實際的行動，例如在農村的場景裡，農民的濫捕、偷竊、祕密地逃稅逃役或對地主所要求的工作怠惰等，都是被支配者的抵抗之隱藏文本。相對而言，支配者的豪華物質享受與特權，或者暗中僱用殺手惡棍、使用賄賂或不擇手段獲取種種土地利益即是支配者的隱藏文本，這些實際行動在每一次暗中進行時，在在都悖反著彼此群體的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s）；3. 在隱藏的文本和公開的文本之間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角力的空間，兩者相互界定的邊界不斷變動，相持張力猶若拔河，其鬥爭也是無所不在、無時不有地進行著（ibid.: 14）。姑且不論抗戰時期東北青年抵抗的最後目標及其對權力關係的理解，本文認爲史考特的隱藏文本理論，有助於我們理解並詮釋抗戰期間滿洲國的思想控制與東北青年學生投身地下抗日行動，特別是其文藝創作，所產生的抵抗文本。

通過私人書信和話劇公演，紀剛規勸青年同學將對小我的愛轉變為對民族的愛，以此來吸收覺覺團的年輕成員。他說：「當時我們對大專學生的工作，是採取種種形式的青年運動，特別提倡並運用學生課外社團活動。聖誕節的遊藝晚會我們更不能輕輕放過。我們把《虹霓》一劇對內公演。」（紀剛1997: 55-56）《虹霓》是當時紀剛實有出版的單行本，但因為被日本警察沒收，至今散佚，不見於紀剛捐獻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藏品當中，但是可以從紀剛寫給詩彥、勸說其加入覺覺團的書信中看到此作品的梗概：

〔…〕不過改造工作不是能徒憑幻想和熱情所能做到的，在實踐上必須要堅忍沉著貫徹始終地奮鬥著。〔…〕你說你對我所寫那本《虹霓》很喜歡，尤其是對女主角留給那個大孩子那句話「而今啊，是如此的時代，將愛一個人的心分散給大眾吧！」很欣賞。你問我有沒有真實的人物背景。說來很慚愧，那時我還沒有接觸廣大的社會，祇能就近剪影。寫虹是個思想前進的女護士，寫霓是個尚未成熟的醫學生。他追她，而她早有意中人在前方。當她得知她意中人的噩耗時，便決心走向前方繼其遺志為其戰鬥的夥伴服務；為了擺脫霓而不辜負他的熱情，也同時給他開條道路。所以她又說「為了愛的緣故我已將青春的生命投入時代的洪流，假如你還能紀念我的話，請你也走入我們這人群裡來吧。」這故事純屬虛構，不過那句話我卻當做是覺醒後的人生格言。〔…〕落雨後的天邊所張起的七彩虹霓，那霓起於虹而虹起於太陽。〔…〕我們原也不過是太空中一粒塵埃，根本算不得什麼，可是一經時代的真光照耀，也就會多采多姿。〔…〕願你也接受真光的照耀。（ibid.）

紀剛說以前寫給女孩子的信常常是筆下汪洋，目的在於鼓動風氣，激勵思想，而且採用傳閱的方式，內容可以大膽說教，但是這封信的目的在收斂熱情，為了逃避滿洲警察的郵件檢查，祇能隱喻雙關，如「改造」代表「革命」，「奮鬥」代表「抗敵」，「前方」就是「祖國」等（ibid.: 53-54）。由於紀剛是僅次於羅大愚和張寶慈的第三號領導人，在組織裡的八綱十二部的分工綱領下負責吸收、考察和組織青年與婦女部門的工作，這裡他利用了私人書信的寫作形式和男女感情關係的雙重掩護來傳遞凝聚群體、共同抗敵的訊息。《虹霓》中的虹則是取型于吳葵芳（小說中人物名為鍾鳴），即紀剛所吸收的護士同志，她也在聖誕節的《虹霓》一劇公演中擔任女主角。吳與日本特務（實為漢人遠親）接近並進而計劃結婚，消

息一出，紀剛與之接觸瞭解，原來吳葵芳天真地想要吸收這個日本特務進入組織，經紀剛幾番勸說，吳退出了組織，以免既傷害組織，自己又無謂地犧牲。³⁵

紀剛1942年12月出版的作品《火舌集》繼續使用這種私人書信體的表達方式和向女性同仁致意的掩蓋手法來招募新同志，此時仍是上述祕密階段時期，東北的敵後工作在「東北現地中央」的指揮下，爲了推行情報、調查、訓練、宣傳等工作，設立了地下的東北通訊社及東北公論社，除發行綜合性月刊，也刊行情報彙刊、資料研究、訓練教材，在這些硬封面的小冊子之外，爲了培養情緒，鼓舞士氣，也發行一系列文藝性的黑白叢刊，《火舌集》便屬於此叢刊系列，此書原在五二三事件時被長春的首都警察廳沒收，勝利時又從「特高股」的檔案室搶救出來，倖免於焚毀，目前的存在形式是紀剛的手稿重抄本。³⁶

紀剛在〈抗戰時期東北地區的文學活動〉一文中提供了關於滿洲出版的中文文學作品的歷史記述，以此來分辨真漢奸與非漢奸，藉以區分並抹除覆蓋全地區「漢奸文學」的污名（*ibid.*: 613-633）。他將當時作家和其文藝作品分爲三個類別：1. 少數的文化漢奸的著作，例如由滿洲國文教總長鄭孝胥作詞的滿洲國國歌、滿族後裔穆儒丐著的章回小說《昭福創業記》，以歌詠滿洲先祖所建立的輝煌軍功爲庇佑來號召扶持溥儀；2. 祕密參加地下抗日工作者，例如姜學潛（或稱姜興）、金劍嘯和羅大愚三位自發的愛國者所領導的地下抗戰文學活動。姜學潛是滿洲國協和會青少年團中央的文化部長，同時也是滿洲國政治宣傳機關《青年文化》雜誌的編輯。不以特定地下政黨組織身分加入，姜加入覺覺團並負責與家鄉敘事、邊疆文化和全國各地人文地理有關作品的編輯出版工作，使讀者時時興起故國情、民族愛；金劍嘯是一名共產黨領導、詩人、劇作家和畫家，負責校訂長春的《大同報》和哈爾濱的《國際日報》，1936年被逮捕並處決時年僅26歲；羅大愚，如前所述，在文學領域工作之外還對抗日活動產生了

35 吳葵芳後續的遭遇見前註29。

36 《火舌集》重抄本見於莊慧玲、謝小芬編（2011），識別碼：A1-A-014。

airiti

深遠影響；3. 遠離政治的零散作家群體。³⁷一個恰當的例子是作家古丁，可以「面從腹背」形容。他表面上被看作是日本通敵者，但骨子裡仍被認為是日本政府的敵人（紀剛2011: 120-124）。2009年紀剛捐獻清華大學圖書館的手稿文獻中有三卷報告是滿洲日本警察所解讀剖析的抗日文藝作品，其中提到了古丁從1940年代起便被密切監視和監聽。諷刺的是，古丁並沒有死於滿洲日本警察之手，而是在1960年死於他曾深愛的中國的反右運動中。

紀剛捐獻的這三份手稿是面向滿洲國的首都警察副總監三田正夫和中央警務總局長山田俊介所起草的手寫報告。它們包含了從1943年5月4日起稿的報告二，從1943年8月9日起草的報告三和從1943年11月29日記錄的報告四（從1942年7月25日起的報告一並未包括在內）。報告二記載了對文化工作的發展和文學藝術戲劇表演中的思潮運動的調查。報告三分析了被密切監視的左翼作家作品中的馬克思主義傾向，記錄了這些作家在滿洲映畫公司的受任情況，以及在不同劇團中演員的參演情況。報告四則提供了這些左翼作品的片段以及滿洲日本警察對此的評價。日本學者岡田英樹（2001）認為，這些日語手稿中的內容是不一致的，而且一些詞彙的使用不甚恰當或有錯誤，推測這些手稿是由不同人撰寫拼湊而成，其中有些人甚至是對日語寫作不甚精通的中國人。³⁸

滿洲國民政部警務司由甘粕正彥在1932年成立，1930年他崛起自南滿洲鐵道東亞經濟調查局的奉天主任，既而輔佐奉天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為其參謀。他曾協助將溥儀祕密從天津租界偷運到滿洲國，1937年擔任中央本部總務部長，1939年他還成為了滿洲國映畫協會的理事長。

37 這是紀剛綱要式的文學史評論，中日專業學者如岡田英樹、張泉、柳書琴、劉曉麗的研究成果早已超越紀剛的這篇文章。

38 岡田英樹獲得這些極密手稿資料的過程，就其所述，是由美國研究東北文學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臺灣發現的，該資料曾向黑龍江大學的陳隄教授展示，後複印流傳到作家山丁、東北師範大學呂元明教授、日本的神戶大學西垣勤教授處，岡田分別從呂、西垣教授處獲得影印本（岡田2013: 412）。而根據紀剛的口述傳記，葛浩文於1986年受陳隄邀請到黑龍江大學擔任客座教授，1993年紀剛舊地重游，托葛浩文的介紹，得與陳隄會面暢談（紀剛2011: 118-119）。估計葛浩文在臺灣所發現的手稿，應是舊識紀剛所獻。

此協會延攬了許多中國電影劇作家，其寫作和通訊活動都被密切監視。

在民政部的體系裡，警察機關的最高領導為警務司，其建立主旨在支持關東軍鎮壓民間起義和攔截對手的特別情報任務。1937年7月治安部成立，民政部警務司并入治安部。治安部由軍政司、參謀司和警務司組成。1937年12月，日本撤銷治外法權，將關東軍和外務省大批富有殖民統治經驗的警察和憲兵力量轉任至滿洲國，並移交其武器和裝備來支持並擴展滿洲國的情報任務，隨時準備武裝鎮壓。1938年4月，在關東軍的指導下，仿照德國盖世太保成立了以諜報謀略和防諜的祕密警察機關——保安局，中央保安局長官由治安部次長兼任，各省地方保安局長由各省警務廳長兼任，省特務科長兼任地方保安局理事官，中央保安局由關東軍司令部第二課的軍官任參與官，地方保安局由駐當地的特務機關長任參與官，分別掌握各級保安局的實權。1943年4月，戰局緊張，撤銷治安部，設軍事部，新設中央警務總局，代替原來的警務司，其第一任警務總長是山田俊介，滿洲國政府之所以任命山田，乃為擴大思想審查和防制空襲範圍。在此期間，全部警務力量共有十萬人，其中約八千名日本人有著關東軍和日本軍事警察背景，是專職特務（中央檔案館編1993: 439-443）。

根據1954年三田正夫的戰後審判的供詞（*ibid.*: 717; 岡田英樹1994），中央警務總局的組織結構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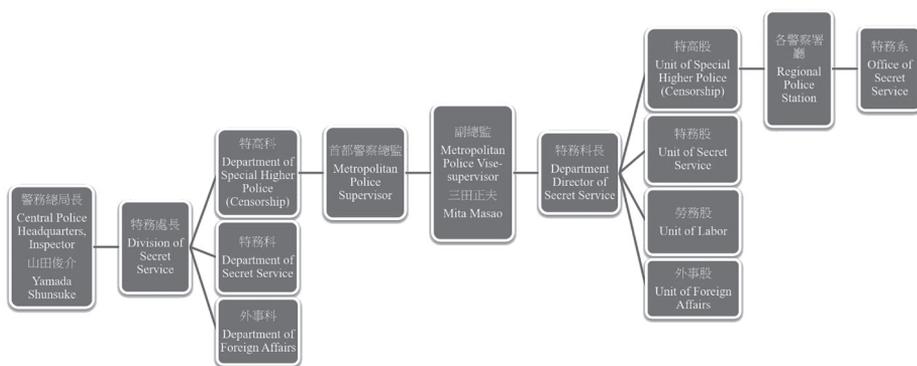


圖1：滿洲國警務機關結構圖

資料來源：岡田英樹（2001）

除了中央警務總部任職局長，山田俊介也擔綱中央保安局，三田正夫則是新京地方保安局局長。三田供認這兩個機構都遵照關東軍指示，對國民黨及共產黨的抗日運動進行監視，並在沒有任何公開審訊和聽證會的前提下將這些活動者殺害。特務科的祕密警察總共超過200多人，其中包括在保安局任命的80人，在首都警察廳特務科任命的60人和在其他地方辦事處的80人。三田坦白他在1943年3月下指令鎮壓抗日活動，在1943年8月開始擴大外圍偵諜網伸向奉天（瀋陽）和其他區域，並密切搜尋、監視藝術團體和作家的活動。三田甚至授權其下屬通過鞭刑、電擊、水刑、藥物注射以及其他酷刑來進行審訊，最後由他下令在保安局內虐殺。其中最令人髮指的是特務科的酷刑，爲了消滅這些抗日活動人士，由三田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其他重刑後，透過新京（長春）憲兵隊，將這些政治犯送往關東軍進行生物實驗的活體解剖室做細菌試驗用（中央檔案館編1993: 716-722）。

三份手稿正是警務總局新設之後開始起稿的，以下是從手稿中摘錄的日本祕密警察評註，挑讀出反日的段落和抵抗的意味。³⁹這些文藝作品由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作家發表於《青年文化》，此雜誌爲滿洲國協和會於1935年至1942年建立的政治宣傳機構。國民黨特工王天穆被主編姜學潛（或稱姜興）說服，將家產變賣來支持雜誌運營，並在1943年8月重新發行《青年文化》，而手稿二則顯示，在此期間王天穆一直受到密切監視。儘管《青年文化》在1945年1月被停止發行，它仍舊是廣受訂閱、備受推崇的雜誌，在每月發行文藝作品和社論來與主流宣傳媒體競爭（劉曉麗2008: 171-227）。在收留因一二·三〇事件被捕入獄又逃出的作家李季風之後，1944年5月山田俊介下令逮捕王天穆等10名抗日人士。根據于堤所整理的資料，王天穆被關押在長春的中央保安局收容所，在獄中受盡折磨，審訊後，連帶其他抗日人士被毒殺在收容所內（于堤1990: 31）。以下的摘錄，即是呼應紀剛在《滾滾遼河》中所描述的利用隱喻雙關語，俾以寄寓愛國愛鄉的民族思想於文藝寫作中。而滿警之所以能夠滲透解讀這些隱密於字

39 整個手稿的檔案名是C14-1滿洲首都警察資料-1（莊慧玲、謝小芬編2011）。

裡行間的寓意，乃是滿警利用所招募的漢人警察的幫助，或是脅迫被捕的作家協助檢查報刊文字。⁴⁰

（一）山丁。〈拓荒者〉，《青年文化》創刊號（1943年8月）

1. 期刊第86頁：

「你不要氣我罷，
你這個叛逆的畜生！
你是祖先的敵人，
你不是我們的子孫！」
老人底聲音也在哆嗦。
「我並不向你乞討，
什麼陪葬也不索要，
我是從土裡長起；
我還要回到土裡。」

滿警的分析：藉著老人對兒子的教訓來鼓吹民族意識和愛國愛鄉的思想。

2. 期刊第90頁：

兄弟，你爲什麼早不回來，
早回來挺起我們的腰板，
那些野狐偷吃了我們底葡萄，
那些山鼠盜破了我們底倉房，
我們底綿羊被豹狼叨去，
我們底牲口全牽進市場。
兄弟，你回來了再不要回去，
這家業須由你來撐起，
不要遲疑，再不要遲疑！

滿警的分析：「野狐」「山鼠」「豹狼」都是象徵著日本，亦即日本掠奪滿洲的寶藏，鼓動愛國愛土的滿洲民眾不要猶豫，起來驅逐日本人，重建滿洲。

40 1943年春夏之際，作家李季風、關沫南、王光逵被囚於首都警察廳的拘留所，特務科命令他們替特務科檢查報刊文字，李、關、王三人協議以成名作家爲目標，以期日本特務有所顧忌，不敢輕易下手逮人（鄭新衡2010: 201）。

老人與兒子的關係是值得深究的，中國與日本同源出儒家文明東洋文化，其發展的順序類似父子的先後傳承，日本現代化後，殖民東亞，反撲悖逆祖先的精神遺產。其「畜生」（反文化反文明）一語的使用，與底下段落以豺狼為象徵的分析呼應。

（二）爵青。〈每月評論〉，《青年文化》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10月）

1. 期刊第81頁：

但是若不能頑固地自覺到國境，這種文學製作和文學鑑賞就是相當危險的遊戲了。

滿警的分析：這裡所謂的國境就是指民族，文藝工作者若是沒有不時地考慮到自己的民族，其結果是文學創作的危險遊戲。

2. 期刊第81頁：

我決不是說日滿華之間的文學的會合或交友，大有消滅了國境之虞；文學的國際的交流，——內質的，根本的——的問題，正需要我們加以慎重考慮，極力加以推進，我們既需要吸入豐富的日本文學，也需要借鏡於中國文學。不過如果沒有國境的自覺，恐怕一切都不足為功，而將歸於徒勞也未可知。所以我們不得不深加反省，——「文學縱無國境，而人有國境」。

滿警的分析：日滿華之間的文學交流跟交友一樣，絕對不是在消滅民族的界限，是要相互借鏡，無法消滅各民族的文化防線。換句話說，強調國際的文學工作不能失去民族意識。

（三）吳瑛。〈鳴〉，《青年文化》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10月）

1. 期刊第90頁：

你，你是一條狗，你搶去了我的一切，你佔據了我的一切，你還要慢慢地凌虐我的肉，你用你的慢性殺人的手段來制服我剝奪我，我什麼都沒有了，我只有的一條命：這條命我要跟你拼一下〔…〕

滿警的分析：此段暗示日本剝奪滿系民眾的原先擁有。

2. 期刊第90頁：

你想，你凌虐了我，剩下我的一部分的弱小的家族的財產，你也還想佔有它，你說，你爲了過分的貪圖，你是多麼殘忍呵！你要滅了我的家族。

〔…〕

又有一次你和我的生父反了臉，你就把我和我的生父的關係切斷

了，你禁止我和我的父親會面的事情，也禁止通信，叫我不認識我自己的血族了，天！這是什麼世界呀！

這樣的事情，你聽到了麼？我要你聽見，你爲什麼醉睡呢，你醒吧！你看看我的反叛丈夫的臉，你看看我的瘋狂的眼睛，我的暴跳的肌肉。我的一切一切都在和你抗爭〔…〕

滿警的分析：這裡的夫指的是日本，我（日文：妾）是滿洲，生父暗示著中國，日本無法滿足的貪婪，佔領了滿洲，進而侵略中國，意圖消滅中國民族。

爲了精確理解這些被加密的熱血敘事，祕密警察必須成爲這些文藝作品最認真、最嚴苛的讀者，在滿洲國體制的現實裡，這些通譯中日雙語的漢人警察選邊站、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他們在閱讀過程中心裡難道不會有些觸動嗎？他們並沒有像吳葵芳的日本特務夫婿，爲避免成爲通敵者而遠走他鄉，也許是他們看不到最後戰爭勝利的可能性與過程中抵抗的必要性，也許就如卜正民所說的，在抗日和通敵之間，這些夾在兩個政權體制之間的平凡百姓，當下爲生存做了不計後果的抉擇（卜正民2015: 299-308）。另一方面，紀剛、山丁、爵青和吳瑛在二十歲左右時寫下了這些作品，在嚴密審查的壓力下出版了這些加密的文字，以此宣洩對日本統治者的責難。這些文本也只有在高壓支配體制下才能生產出充滿情緒和感情的批判，並暗示著各種可能的抵抗行動、以鼓動讀者參與和凝聚文化政治的認同。這些文藝作品能夠通過滿洲國政府審查的機制而出版，是借助地下工作人員的滲透，這也意味著隱藏的文本和公開的文本，在寫作、出版審查和再次解碼的過程中，不斷角力、不斷地相互界定，而1941年一二·三〇事件以及1945年的五二三事件正是兩者角力正面衝擊爆發的結果。

六、結論

就書寫本身而言，如杜贊奇所提示的，在滿洲國文學作品中經常使用當地的景觀意象、鄉土敘事、邊疆民族文化和地理來作爲比喻，這些比喻都寓意著不折不撓地生產製造真實來反抗現實。甚者，我們發現紀剛及其同僚不

airiti

僅使用這些意象來躲避祕密警察的審查，也用來批判國民政府對東北抗戰現場上的缺席和無作為。因此，對滾滾遼河及故土的情感敘事幫助了他們跨越滿族與漢族的界線，也加強了他們對群體的認同和凝聚。

本論文所述是中日對抗中有關中國青年保護東北故鄉的抵抗面向，與公開的軍事活動相比，紀剛及其同僚參與的這些地下情報活動和其他抗日運動或許不能徹底推翻滿洲國政權，但就消耗戰及長期抵抗而言，這些活動對癱瘓行政體系、潛入政府機關以及滲透社會各領域，都具有滴水穿石的效果。此外，學生參與戰爭活動也響應了國民政府三軍統帥蔣介石委員長對全國總動員的號召。

戰後的歷史研究中經常觸碰此一爭議點：究竟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領導了抗日革命？⁴¹因為兩黨在戰爭中的貢獻導致了對日後新中國政權歸屬的合法性是海峽兩岸政權必爭之歷史話語權，而學生的抗日現場參與以及祕密地下情報的組織形式，使得這些議題更加複雜化，例如：1923年共產黨的三大會議中陳獨秀公布黨員總數為420人，隔年增為18,526人，工人農民占絕大多數；1927年五大時為57,967人，1932年到達12萬左右，經過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之後，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戰之際，全國共產黨員只剩4萬人，1938年9月六中全會決議大量發展黨員，吸收青年學生、女工、農婦和知識分子婦女，黨員人數衝上50萬，到抗戰勝利時為120萬人，1949年奪得政權時已發展到448萬人。這些人數的急遽翻倍上升，中共中央黨部曾反省其入黨過程不乏「異己份子、投機份子和奸細」（高志中2016）。據筆者前述，抗戰時期兩黨在東北發展地下組織盤根錯結，國民黨的雙軌制，若無羅大愚等核心成員居中聯繫登記並爭取活動經費補助，少數地區組織和幹部成員容易被誤認為共產黨員，而位於後方的中央黨部無法直接掌控指揮各區域的成員，一旦局勢有變，地方成員難免誤認誤傷，將錯就錯！

41 米德（Mitter 2013）直接回答了「誰抗日？」的學界大問題——即國民黨的軍隊在抗日戰爭中最有貢獻。當然，米德的結論不會是一錘定音，但是較具共識的說法。

兩黨的恩怨情仇也見證於兩位人物的時代命運，前述的作家李季風1945年4月第三次被捕，囚於瀋陽祕密監獄，8月15日抗戰勝利後國共合作結束，隔二日出獄，羅大愚的左右手張寶慈也同日出獄，信仰共產主義的李季風找到張寶慈，要求書面辦理退出國民黨的批准手續，8月23日張答應辦理後差手下領李季風去，途中手下槍殺李，李倒地送醫不治（鄭新衡2010: 318-319, 413-415）。⁴²張寶慈在國民黨復員東北時擔任瀋陽市議會議長和瀋陽市的國民大會代表，在東北政權易手之時堅守崗位，之後化裝逃出，在前往錦州的途中，因遇見他已投共的學生而被識出，因而殉職（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1: 430-432）。⁴³

留在大陸的成員，其中或者後來投共、或者原先就是滲透入國民黨地下組織的地下共產黨員，都要面臨後來文革「十年動亂」的政治審查。只舉一例以見其複雜性，在東北青年自發成立的抗日組織中，因忌於滿洲國的規定，不敢公開命名，只以讀書會的形式進行，但成立時或是面向重慶敬禮行儀，唱的國歌是國民政府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而不是共產黨的「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於是文革時面對政治審查就難以交待了（鄭新衡2010: 361-362）。因此戰後爭論抗日地下組織是否為國民黨或共產黨所為，對個人而言，真不知這是為熱血的抗日青年爭功呢？還是為其爭罪呢？

曾經擔任滿洲國日本祕密警察的加藤豐隆不僅捐獻了他戰時同僚書寫的祕密手稿，1968-1976年期間也完成出版了三部對日本祕密警察的歷史記載。⁴⁴他自發翻譯的《滾滾遼河》聚焦於五二三事件——當時許多國民黨地下工作者被捕入獄並被折磨至死也不願供罪的種種事蹟，他借用「監獄」來作

42 關於是否因為李季風要求退黨而遭受張寶慈下令手下槍殺一事，紀剛持保留態度，建議鄭新衡（原名李季若）查出李季風第三次被捕的獄中取調記錄（鄭新衡2010: 390）。

43 1988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核定張寶慈入祀國民革命忠烈祠，見史五字第147號，3月30日。此文件收錄於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1983-2005: 3: 34）。

44 前述加藤豐隆（1968-1976）的三卷著作為《滿洲國警察小史》第1編至第3編。

爲日譯本的標題，那是借用了紀剛對滿洲國的比喻。⁴⁵作爲生活在1930-1940年代滿洲的同輩年輕人，紀剛、加藤和另一位《滾滾遼河》的譯者山口和子因國別不同而成爲敵人，並被困在滿洲國的政權結構所存在的條條框框中對峙（不特指監獄）。然而，戰後，他們卻通過不同譯本中對戰爭記憶進行書寫，這不僅在個人層次上提供了中日和解的可能契機，更將隱藏的文本翻轉化爲公開的話語，進而超越了權力的二分結構。相較於日本政府對二戰期間侵略亞洲的否認和不負責任的態度，紀剛、加藤和山口的書寫行動開啟和解的契機，顯示個人是可以邁步先行於國家的。

更難得的是，在血淋淋的交戰的同時，在敵我生死針鋒相對的國家意識形態的框架下，同時代的中日青年如梁肅戎和具島兼三郎在長春的監獄裡能夠看到彼此的苦難，以及爲自己不同的生命理想和存在目的而抵抗日本的戰爭體制，並進而創造出不同的存在意義，而惺惺相惜！同樣在長春監獄裡的日本秘密警察也能在嚴刑拷打羅大愚、紀剛及其同仁的過程中，發現他們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抱負和臨危不屈的殉道精神，而肯定爲可敬的敵人！據此比較，本文所闡發的這一層抵抗的「創意」的目的意涵，更高於第二層借用史考特的「隱藏的文本」的「創意」的藝術化隱喻策略。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Brook, Timothy (卜正民)，林添貴 (Lin, Tianguai) 譯。2015 (2005)。《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 *Tongdi: Erzhan zhongguo de riben tewu yu difang jingying*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臺北 (Taipei)：遠流 (Yuan-Liou Publishing)。

Gushima kanesaburo (具島兼三郎)，王良 (Wang, Liang) 翻譯。1981。〈永遠的懷念：一位日本學者心目中的我國東北抗日地下工作者畫像〉

45 另有地工同志對加藤豐隆在長春監獄施電刑於同志和自己，依然耿耿於懷，不肯原諒，見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編 (1983-2005: 5: 323-326)。

“Yongyuan de huannian: yiwei riben xuezhe xinmuzhong de woguo dongbei kangri dixia gongzuozhe huaxiang” [Forever Miss: A Portrait of Underground Workers in the Northeast of my country in the Mind of a Japanese Scholar]，《傳記文學》*Zhuanji wenxu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38卷4期，頁80-85。

于堤 (Yu, Ti)。1990。〈長春人民抗日鬥爭部分史料〉“Changchun renmin kangri douzheng bufen shiliao” [Historical sources of People’s Anti-Japanese Struggles in Changchun]，《長春史志》*Changchun shizhi* [Changchun Gazetteers] 第2期，頁24-33。

——。1993。〈羅大愚在東北地下抗日活動簡介〉“Luo Dayu zai dongbei dixia kangri huodong jianjie” [Brief Introduction of Luo Dayu’s Undercover Organization of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in Manchuria]，《抗日救亡》*Kangri jiuwang* [Anti-Japanese and Saving China]，孫邦 (Sun, Bang) 主編，頁711-720。長春 (Changchun)：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renmin Publishing)。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Archives,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藏。1939/06-1944/02。《朱家驊檔案》*Zhu Jia-Hua Dangan* [Archives of Zhu Jia-Hua]。檔號 (No.)：301-01-06-242。

中央檔案館 (Central Archives) 編。1993。《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偽滿憲警統治》*Riben diguo zhuyi qinhua dangan ziliao xuanbian: Weiman xianjing tongzhi* [Selected Sources of Japanese Imperialist Invasion in China: The Rule of Military Police in Manchuria]。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 (The Editing Committee of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for the May 23 Incident) 編。1981。《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紀念文集》*Wuersan mennan ershi zhounian jinian wenji* [The Memorial Collection of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for the May 23 Incident]。臺北 (Taipei)：文海出版社 (Wenhai Publishing)。

王良卿 (Wang, Liang-Ching)。2012。〈情報領袖與派系政治——從國史館新進史料觀察戴笠和CC系勢力的競爭〉“Qingbao lingxiu yu paixi zhengzhi—cong guoshiguan xinjin shiliao guan cha Dai Li he CCxi shili de jingzheng” [Competition about the Intelligencers in Factional Politics: Dai Li’s Struggle Against the CC Clique]，《國史館館刊》*Guoshi guan guankan* [Bulletin of Academia Historica] 33期，頁119-145。

朴宣冷 (Park, Sunyoung)。2002。〈體制內抵抗：滿州國統治之下的祕密反日活動〉“Tizhineidikang: Manzhouguo tongzhi zhixia de mimi fanri huodong” [Internal Resistance: Secret Anti-Japanese Movements under the Manzhou Government in Manchuria]，《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Chinese Studies] 20卷1期，頁369-397。

汪宏倫 (Wang, Horng-Luen) 。2014。《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 *Zhanzhen yu shehui: lilun, lishi, zbutijingyan* [*War and Society: Theory, History, and Subjective Experience*]。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社 (Linking)。

林志宏 (Lin, Chih-Hung) 。2007。〈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 “Wangdao letu: Qing yimin de qinggan dizhi he canyu Manzhouguo” [Dreamland of the Kingly Way: Emotional Resistance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Qing Loyalists in Manchukuo]，〈《新史學》 *Xinshixue* [*New History*] 18卷3期，頁45-101。

——。2009。《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 *Minguo nai diguo ye: zhenghi wenhua zhuanxingxia de Qing yimin* [*The Chinese Republic as Enemy: Qing Loyalists in a Shifting Political Culture*]。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社 (Linking)。

林桶法 (Lin, Tung-Fa) 。2009。《1949大撤退》 *1949 Dachetui* [*The Great Retreat in 1949*]。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社 (Linking)。

孫邦 (Sun, Bang) 。1993。《偽滿軍事》 *Weiman Junshi* [*The Military Affairs in Manchuria*]。長春 (Changchun)：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renmin Publishing)。

胡相洋 (Hu, Xiangyang) 。2015。〈抗戰回憶錄：父親在絞刑架旁聽到日本投降消息〉 “Kangzhan huiyilu: fuqin zai jiaoxing jiapang tingdao riben touxiang xiaoxi” [The memoir of Anti-Japanese War: My Father heard the News about the Japanese Surrender at the Gallows]。Retrieved from: http://www.dailyqd.com/arc/2015-08/14/content_267966.htm on Sep. 9, 2019.

高志中 (Gao, Zhizhong) 。2016。〈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黨條件和黨員標準的演變考察〉 “Minzhu geming shiqi zhonggong rudang tiaojian he dangyuan biao zhun de yanbian kaocha” [The Change and Survey of the Recruiting Criteria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Eras]，〈《中共黨史研究》 *Zhonggong dangshi yanjiu* [*The Studie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第7期，頁120-127。

紀剛 (Ji, Gang) 。1993。〈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國國民黨人在東北的活動補充發言〉 “Jiuyiba shibian qianhou zhongguo guomin dangren zai dongbei de huodong buchong fayan” [A Supplemental Statement for the KMT Party Activi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十五輯 *Zhongguo xiandai shi zhuan ti yanjiu baogao 15* [*Seminar on Topical Issu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5*]，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The ROC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ical Sources) 編，頁 234-236，臺北 (Taipei)：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1997。《滾滾遼河》 *Gungun Liaobe* [*Rolling Liao River*]。臺北 (Taipei)：

三民書局（Sanmin shuju）。

紀剛（Ji, Gang）口述，趙慶華（Zhao, Qinghua）主編，柳書琴和李卓穎（Liu, Shu-Chin and Li, Cho-Ying）主持整理。2011。《涉大川——紀剛口述傳記》*Shedachuan—Ji Gang koushu zhuanji [Across Great River—Ji Gang's Oral Biography]*。臺南（Tainan）：國立臺灣文學館（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莊慧玲、謝小芬（Chuang, Hwei-Lin and Hsieh, Hsiao-Chin）編。2011。《「滿洲國」到台灣：紀剛、《滾滾遼河》及「滿洲國」地工群體文獻、文物、影音數位典藏》*Manzhouguo dao taiwan: Ji Gang Gungun Liaobe ji Manzhouguo digong qunti wenxian wenwu yingyin shuwei diancang [From Manchuria to Taiwan: Digitalization of Ji Gang, Rolling Liao River and their Undercover Organization's Related Sources, Materials and Interviews]*。新竹（Hsinchu）：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Library）。Retrieved from: <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project/jigang/index.htm> on Sep. 9, 2019.

國史館（Academia Historica）。1973。〈羅大愚褒揚令〉“Luo Dayu baoyang ling” [Testimonial Award to Luo Dayu]。登錄號：1280020170001A。

梁肅戎（Liang, Su-Jung）。1993。〈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國國民黨人在東北的活動〉“Jiuyiba shibian qianhou zhongguo guomin dangren zai dongbei de huodong” [The KMT Party Activi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十五輯*Zhongguo xiandai shi zhuanji yanjiu baogao 15 [Seminar on Topical Issu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5]*，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The ROC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ical Sources）編，頁195-205，臺北（Taipei）：國史館（Academia Historica）。

黃自進（Hung, Tzu-Chin）。2006。〈九一八事變時期的日中政治動員與軍事作戰〉“Jiuyiba shibian shiqi de rizhong zhengzhi dongyuan yu junshi zuozhan” [Japanese and Chines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Military Tactics during the Mukden Incident]，《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Guoli zhengzhi daxue lishi xuebao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istory Journal]* 26期，頁169-231。

鄭新衡（Zheng, Xinheng）。2010。《一二·三〇事件始末：東北青年反滿抗日地下鬥爭史事紀》*Yier sanling shijian shimo: Dongbei qingnian fanman kangri dixia douzhengshi shiji [The History of the December 30 Incident: A Struggle of Manchurian Youth's anti-Manchukuo and anti-Japanese Activities]*。瀋陽（Shenyang）：遼寧大學出版社（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鄭德庫（Zheng, Deku）。2015。〈以《星火》的名義〉“Yi Xinghuo de mingyi” [In the Name of *Starlite*]。Retrieved from: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2/29/10/148605_82233189.shtml on Sep. 9, 2019.

- 劉恆興 (Liu, Heng-Hsing)。2012。〈大道之行也：「滿洲國」大同時期王道思想及文化論述 (1932-1934)〉“Dadao zhixing ye: Manzhouguo datong shiqi wangdao sixiang ji wenhua lunshu (1932-1934)” [When the Great Way Prevails: Thought and Cultural Discourse on the Kingly Way in Datong Period Manchukuo (1932-1934)], 《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Chinese Studies*] 30卷3期, 頁297-329。
- 劉曉麗 (Liu, Xiaoli)。2008。《異態時空中的精神世界：偽滿洲國文學研究》*Yitai shikong zhong de jingshen shijie: Wei manzhouguo wenxue yanjiu* [*The Spiritual World in a Heteromorphous Time and Space: A Study of Manchukuo Literature*]。上海 (Shanghai)：華東師大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羅久蓉 (Lo, Jiu-Jung)。2000。〈軍統特工組織與戰後漢奸審判〉“Juntong tegong zuzhi yu zhanhou hanjian shenpan” [The Agency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the Post-war Trial of Traitors], 《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49 Nian: Zhongguo de guanjian niandai xueshu taolunhui lunwenji* [*Conference Proceeding of China 1949: the Eventful Year*],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編, 頁515-546, 臺北 (Taipei)：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 (Luo Dayu xiansheng shishi shizhounian jinian choubeihui) 編。1983-2005。《山高水長》一至七卷 *Shangao shuichang 1-7* [*High as Mountains and Long as River: Nobility Lasts Forever 1-7*]。一至三卷為臺北 (Taipei)：自行出版 (Self-Publishing)。四至七卷為臺中 (Taichung)：自行出版 (Self-Publishing)。
- 簡笙簧 (Chien, Sheng-Huang) 口述, 田南萍、洪宜嬪 (Tian, Nan-Ping and Hong, Yi-Zhen) 整理。2009。〈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同仁群像 (一)〉“Luo Jialun guanzhang shiqi guoshiguan tongren qunxiang (1)” [Academia Historica Staff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irector Chia-lun Lo (I)], 《國史館館訊》*Guoshiguan guanxun* [*The Academia Historica Newsletter*] 3期, 頁182-193。
- 張錦堂 (Zhang, Jintang)。1981。〈日本戰後研究「九一八」事變和偽滿洲國的主要書目和論文索引〉“Ribei zhanhou yanjiu jiuyiba shibian he wei manzhouguo de zhuyao shumu he lunwen suoyin” [A Bibliography of Japanese Post-war Studies of the Mukden Incident and Manchukuo], 《中國現代史 (複印報刊資料)》第20期 *Zhongguo xiandai shi fuyin baokan ziliao 20* [*News Press Reprint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20*],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The Center of Bibliographical Sources in the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編輯。北京 (Beijing)：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The Center of Bibliographical Sources in the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柳長勛 (Liu, Changxun)。1995。〈東北抗日地下工作列入國史序〉“Dongbei

kangri dixia gongzuo liru guoshixu” [The Contribution of Anti-Japanese Undercover Organized Activities in Manchuria to the National History], 《山高水長》第四卷 *Shangao shuichang 4* [*High as Mountains and Long as River: Nobility Lasts Forever 4*], 羅大愚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籌備會 (Luo Dayu xiansheng shishi shizhounian jinian choubeihui) 編, 頁23-96。臺中 (Taichung) : 自行出版 (Self-Publishing)。

二、日文書目

- 井村哲郎。1995。〈滿洲國關係資料解題〉（〈滿洲國關係資料解說〉），《滿洲國の研究》（《滿洲國的研究》），山本有造編，頁535-605。東京：綠蔭書房。
- 岡田英樹。1994。〈「滿洲國」首都警察の文芸界偵諜活動報告〉（〈滿洲國首都警察偵查文藝界活動的報告〉），《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6卷2號，頁1-31。
- 。2001。〈滿洲國首都警察の檢閲工作〉（〈滿洲國首都警察の偵查思想工作〉），《立命館文学：The Journal of Cultural Sciences》567號，頁38-46。
- 。2013。《続文学にみる滿洲國の位相》（《文學中所見的滿洲國態勢—續集》）。東京都：研文出版。
- 前野茂。1972。《滿洲國史》（《滿洲國史》）。東京：滿蒙同胞後援會。
- 紀剛著，加藤豊隆訳（譯）。1968-1976。《滿洲國警察小史》（《滿洲國警察小史》）第1編至第3編。松山：元在外公務員援護會。

三、英文書目

- Barret, David P. and Larry N. Shyu, eds. 2001.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amant, Neil J. 2011. “Conspicuous Silence: Veterans and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War Memory i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45(2): 431-461.
- Duara, Prasenjit. 2003.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Mitter, Rana. 2000.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13.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Mitter, Rana and Aaron William Moore. 2011. "China in World War II, 1937-1945: Experience Memory, and Legacy," *Modern Asian Studies* 45(2): 225-240.

Moore, Aaron William. 2011. "The Problem of Changing Language Communities: Veterans and Memory Writing in China, Taiwan, Japan," *Modern Asian Studies* 45(2): 399-429.

Scott, James C.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